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第一卷 第九期

燕大季聲

司徒校務長六十

壽辰特刊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內 政 部 登 記 證 字 第 肆 肆 號

獎狀

甲字第一百陸拾肆號

美國人司徒雷登 (Dr. J. C. Stearns) 自民國八年起以迄今日先後為北平私立燕京大學經募建築設備經常等費暨該校基金約達國幣貳千萬圓按照捐資興學褒獎條例之規定特授與一等獎狀此證

教育部部長

中華民國



本刊目錄

者，以離母校較遠者居先

司徒校務長傳略

題字

國民政府林主席

教育部王部長

實業部吳部長

前任代理校長周寄梅先生

祝詞

校董會主席孔庸之先生

前任校長吳雷川先生

代理校長陸志章先生

校友會主席全紹文先生

薛瀛伯先生

學生自治會

壽聯

北平市社會局雷局長

特約論著

劉廷芳教授

辦教會大學的困難

司徒雷登——困難之征服者

司徒雷登——仍在困難中掙扎者

校友撰文（以年級先後為序，年級同

各地校友分會獻辭

（六月十五日以後收到者恕未及登刊）

雜俎

司徒雷登先生故鄉感恩禮拜記

校友簡訊

司徒校務長壽辰慶祝秩序

統計圖表

歷年學生總數比較圖

歷年教員總數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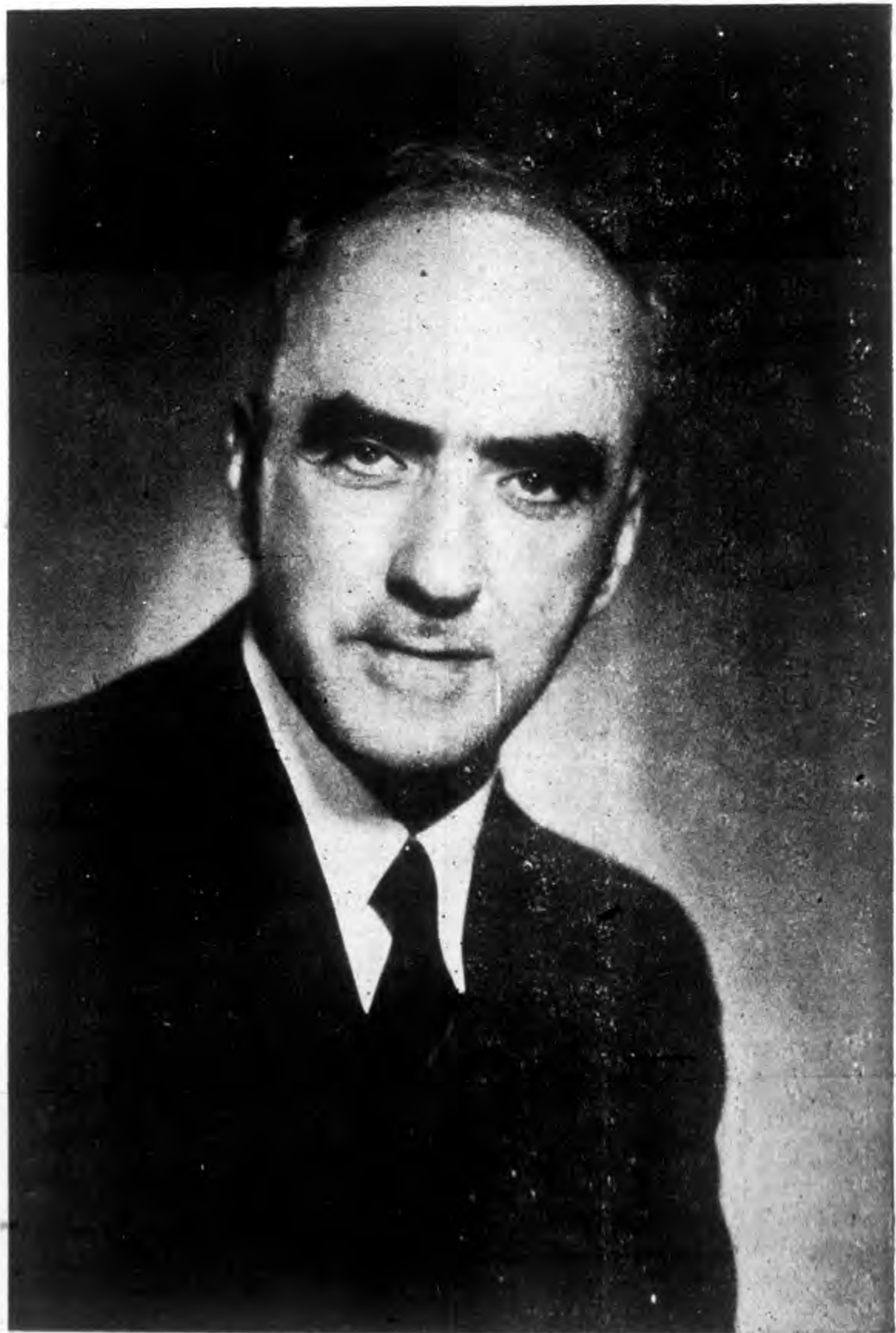
全校學生籍貫分配圖

本校校友分布圖

壽序

本校國文系同人

插圖



司徒雷登博士傳略

包貴思女士(Grace Boynton)撰
冰心譯

司徒約翰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先生，一八七六年，生於中國杭州。他的「開路先鋒」的家傳，從他後來的事業看來，是有特殊的興趣的。他的曾祖父由弗基利阿(Virginia)遷居於邊省的肯塔基(Kentucky)，在那裏，他做了德蘭斯斐利亞大學(Transylvania College)的校長，這鎮離雷克星吞(Lexington)很近。這位司徒羅伯(Robert Stuart)先生的兒子，司徒大衛托德先生(David Todd Stuart)是林肯亞伯拉罕(Abraham Lincoln)夫人，托德馬利亞(Mary Todd)的表兄弟。這位祖父又創立了一個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名為司徒大學(Stuart College)是當地的第一個女子大學。繼承着這冒險的家傳，司徒博士的父親司徒爾(John I. Stuart)先生，同着最早一班的宣教師來到了中國。爲着對於促進教育的本能的忠誠，他在杭州創設了一個小學校，這學校不久便被教會關閉了，因爲他們以爲言講福音是傳教師的主要工作。

爲方便起見，在此多少提到對於司徒博士青年時代，很重要的經驗與影響。在他的童年，家庭是學校，醫院，社會的綜合物，因着這家庭孤立在異族異文化之中，家庭的維繫是很強的，家庭的情誼是很深的。在此，應當提到司徒哈同瑪利夫人(Mary Horton Stuart)，司徒博士的母親。

作者從未會過他的父親，但司徒太夫人，從她在北平和她的公子同居時起，都是個極生動的回憶。我們常說一個人的成功，常受偉大的母親之賜。在司徒博士的時代，一切教士的母親，必須有過人的天才與能力。她不但是孩子的母親，還必須兼任醫生，護士，裁縫，教師等職。她必須做這些工作，同時還得以大半的心思與力量，放在她丈夫的事業上。司徒太夫人，把這一切都做到了，她不但是熱心的做，做得恰到好處，而且是極溫柔極高興的做着。使她在垂老的年光，在與她相識的人中，仍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在她年已七十的時候，她的精力還是無盡的，但她的精力的顯示，却不是忙亂一路，而是安

詳一路的，使她的人格深入各個人的心中。我不知道是從何時起，是誰起頭的，我只記得一切燕大的教職員與學生都稱她爲「司徒媽媽」。

除了家庭生活以外，司徒約翰雷登是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他也過了中國的生活。他與父母一同在華人中旅行，他們和中國孩子一樣的學習語言。他們也學讀學寫。在十一歲的時候，司徒博士就被送回美國，從那時起，那做傳道者的兒女的痛苦經驗，也就開始，這痛苦就是一種「與衆不同」的意識。這孩子剛從杭州來，用一種苦恨的決心，來隱藏起這「不同」之點。在學校裏，對於他的生長之地，他嚴守着秘密，也很小心的使人不覺出他比和他同年齡的學童，多知道些中國的事。情。

一八九二年，他入了弗基利阿的哈姆普頓西德尼大學（Hampton-Sydney College）。是一個規模較小而能保持它的特點的大學。最近發現這大學的畢業生，名字被列於名人錄的，在數目的比例上，比哈佛大學的還多。在他大學的學程之中，他覺得他的喜好的確是學者的，而且他的最大興趣是希臘文與拉丁文。他傾向於教授生活，他的慾望暗示他，如在一個選定的國地裏，作一個大學教授，一定是他所愛作的，畢業的時候，他得了一項獎學金，使他有繼續研究古文，得碩士學位的可能，爲什麼理由，他沒有解說，他覺得不受這筆獎學金是他的義務。他回到母校蓬塔不斯（Panops）作教員，在那裏任教三年。不久他就覺得這種合乎興趣的工作，可以長做下去的。他對學生們感着興趣；校長也上了歲數了。爲何不在這裏安身立命，以繼續研究與做大學教授爲將來的目的呢？

司徒雷登用了三年的工夫，來思索這答案。在他的心靈深處，他覺得他必須做一傳教士，這就是那反抗的障礙物。他和這壓迫抗鬥至三年之久，他知道他如受了按立典禮，做了牧師，那不可避免的第二步，就是回到中國來，分任他父親的工作。這沉迷於希臘羅馬古文中的年輕學者，杭州傳道的想像，對他是毫無興趣的。

宗教是司徒博士不大談到的題目。在這題目上，他的特性是很少談到很親近的個人問題。但在事業的選擇上，宗教的動機是最高的。他的信仰要求了他的一生。在一八九九年他入了協和神學（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他提到這決定的時候，覺得這一切的結果，是救了他進入一種他不能長做的職業裏去，「與古文敵對的教育趨勢，從那時就已起始，我的捨棄

了拉丁文與希臘文而進入別的園地，幾乎是必然的事情」。這或者可以當作校務長的說話中常有的幽默來看待，但是他又說了非常嚴肅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一日我已屈服於我的意志的獨裁之下，我永遠沒有後悔的理由」。

一九〇二年，他從神學畢業了以後，就和兩位同學，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兩年，為教會募捐。這努力有驚人的成功，「金錢湧到教會裏來」。這兩位同學中有一位就是慕惟德 (Lacy Moffett) 先生，後來與司徒博士同時到中國來的。這兩位青年在為教會工作的時候，來到了盧伊西安那新奧雷安斯 (New Orleans Louisiana)。在那裡，他們邂逅了羅安琳 克林 (Aline and Catherine Rodd) 兩位姊妹。一年之內，這兩對在同一天結婚了，司徒夫婦與慕氏夫婦一同出發到中國來。

司徒羅安琳夫人，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出閣，當年的十二月便來到中國杭州。兩年之後，他們的獨子司徒約翰牧師 (Rev. John Stuart) 便去世了。現在他是包爾提摩爾馬利蘭 (Baltimore Maryland) 的牧師。從他生下來起，這年輕的母親的健康就漸漸下降了，在燕大的人們認識司徒太太的時候，她就軟弱了，常常病得只閉居在她的小屋裏。但在她氣力允許的時候，她喜歡一切的人到她家裏來。我記得她，一個苗條的身材，一個柔和蒼白的臉，軟軟的頭髮，遮在額前，一個又開朗又深沉的微笑。關於她的一切都顯示着玲瓏脆弱，她的嬌軟的南腔，她的輕柔的姿態，她的嫩白的手。她是「司徒媽媽」的一個完美的反襯與襯托，假如司徒媽媽是活潑與精力，這妻子是對於認得她愛她的人呈現了通徹的秀美，如同鮮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在燕大遷到新校址以前的一個畢業會時，司徒夫人病勢轉劇，遂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去世，她的墓是燕大墳園中的第一座墳墓。司徒博士的密友們都知道，在他心中的關於夫人的記憶，是一件完美的物品，與他一同生活着，與日俱增的被寶愛着。

司徒博士在一九〇〇年回到杭州之後，便加入他父親的工作。他也開始研究中國古文，據他說大半是用來代替拉丁文與希臘文的研究的。他繼續着宣講研究有三年之久，就被聘為南京神學的教員。他從美國動身的時候，以為是已關閉的學校生活之門，現在又開啟了。他從前甚至於聽他父親的話，把希臘文 拉丁文的書，也擱下不看了，因為父親說有許多傳教士帶了許多書到中國來，却始終沒有開卷。對於南京神學的延聘，這青年人不敢自己決定。却請他的教會來定奪。他對於學問的傾向顯然是被發覺了，於是他立刻被遣到南京去。「你看」，校務長提到這點時這樣說，「就宣教士而言，我是每趨愈下了。」

起初我捨棄宜講而教學，以後竟捨棄教學而做大學行政了。」

十一年在南京的光陰，從多方面看來，司徒博士覺得很滿意。他沉浸在安靜的學校生活的日程中，在其中他可與同事和學生有最親密的接觸。他發表了許多中文著作，如新約原文必讀，新約啟示錄新註釋，戰爭之替代等，又編了一卷新約希漢英字典以爲他課內之用。在一九一八年他又被聘爲燕京大學的校長。

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踴躍的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這機關是新組織起來的，充滿了騷擾與紛亂。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這新事業的經濟方面更是使人沮喪，預算是五萬元，收支却只有兩萬五千元，那就是說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在美的托事部諸公，也不是對燕大特別關心的人士。燕大在他們眼裏，只是他們許多興趣中之一，所以校務長說，有的人來赴托事部會議，還不知道他們所要表決的事情，是關於燕大的，還是關於斯麥那拜拉特大學（Bayreuth College in Smyrna）。事實上，這開頭是這樣的使人氣短，司徒博士說，他們早已要找一個人來負此重擔。在請到他的時候，他也知道有好幾位人已經被請又已經辭謝了。

在紛亂與沮喪之中，司徒博士看出新的可能來。他看出或者可有一個基督教大學，包括各種學科，對於中國的社會進步上有些貢獻。它可以保持古傳道士的犧牲與服務的動機與價值，而以一種近代的方式表現出來。它或者可成爲一個中外人士不分彼此的合作地場，大家同樣的來分擔這經濟，困難，與成功。至終這些可能性使他心動，使他來到北平。在他北上就聘的時候，他定了一個條件，使他現在回想起來可笑又可異，他約定說他不能替燕大募捐，因爲這不是他的工作。

提到這事使我想起有一次他又是從募捐的旅行回來，他說，「每次我看見叫化子，我總覺得我是屬於他們的行會的」。我們大多數人，總難想到經濟問題會帶來多少壓倒人的責任。我們現在有五百萬元左右的捐款，是司徒博士的努力所得來的。焦慮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燕大的發展太快了，一想到這發展不過是從一八一九年才開始，真是使人難以相信。這階段必須很簡賅的總括起來，我們要記得的是每一階級都承受了金錢，巨量的金錢。這是代表一個人的生機活力的錙銖的積聚。學者的性格，是不會喜愛事務世界的空氣的。作事的人也不容易通曉怎樣老練的去迎合那些有錢的人。在事實上，我們必須

承認，燕大是用了巨大的代價去買來的。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一個青年人來辦事務的困難，并不在一個成年人來加入所謂之「募化遊戲」之下。

燕大發展的第一階級就是聘請（和供給）教授。第二，就是尋訪城外的相當地點，使燕大團體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再後就是校舍的建設。每一所新建築都要求一筆新的維持費。機器廠就是最利害的一個。「和一匹龐大的餓獸一樣」，司徒博士焦慮的說，「你把所有的錢都扔給他，牠立刻吞噬無餘，而且永遠沒有糜足的時候」。

教授和校舍吸引了許多學生，每一個學生又構出經濟上的難題。學生交來的學費（這是全世界大學都一樣的）只抵教育費的七分之一。燕大就沒有財力來抵償這差額。基金就是成爲不可不有的。這是現在最迫切的需要。

司徒博士，對於教育的各方面都感興趣。從起頭他就用幾門功課與幾個學系來試驗，使其能適應社會確定的需要，并知道畢業生是一定有職業的。有幾個這種的試驗，因爲沒有經費，現在都停止了。如今還有的如醫預科，護士預科，新聞學系，和教育學系，都屬於這種性質的。一方面司徒博士從未放棄他對於學問的興趣，有幾種重要的研究，也都因他得到了贊助。最顯着的成功，就是哈佛燕京社。該社專研漢學，是用一位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畢業生郝爾君（Hall）的遺款來設立的。他遺言以他的遺產來建立各種機關與基金社來研究中西文化的接觸。他的許多種捐款都是同一的目的，而燕大所得的是最大的一份。司徒博士說這是因爲遺產的管理人相信了燕大的前途。他們自然是以燕大的校務長爲根據，來推量燕大的前途的。

此外還有司徒博士在校外的事務關係。他做了多年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董事，太平洋學會的會員。他的朋友中，有許多中外的聞人。但是他覺這些事和燕大的工作比起來，都是有限而且是不關緊要的。

在生前來推量某一個人物的事業的意義，是不可能的。但或者可以大膽的說以下的話語：在中與西突然的牽在一起，而且多半是不調和的接觸的時候，司徒約翰雷登自己創造了一個嘗試，來設立一個大學，在這大學裏沒有中西的分別，而且在共同生活裏，大家分擔分享着經濟，困難與成功。

這就在乎燕大的團體，來證明這嘗試已否成功，能否延長。

司徒雷登先生週甲壽辰特刊紀念

樂育春長

林森



敬錄尚書語以祝

司徒先生六十壽辰

正直康彊

王世杰



五年

六月

司徒先生六十壽

修道養壽

吳鼎昌敬祝



司徒先生周甲壽名紀念

壽考

周治中書



司徒雷登博士六十七壽

海西一老風流聲抱道東來願更宏
譽起菁莪褒令甲道瞻模楷頌長庚
談瀛鄒衍應無遠錫嘏奚斯合共賡
世界大同從學始祝延會看蔚羣英

孔祥熙撰祝

因

真

理

得

自

由

以

服

務

右	所	十	蓋	敬	公
燕	制	季	惟	書	磨
京	定	經		此	一
大	者	營	先	訓	九
學	也	維	生	以	三
校		護	能	頌	六
校	先	殫	寔	盛	年
訓	生	竭	踐	德	六
	綜	心	之	以	月
司	理	力	茲	祝	杭
徒	燕	此	值	遐	縣
雷	京	涵		福	吳
登	大	義	先		雷
先	學	宏	生		川
生	校	深	六		
始	務	之	十		
長	垂	校	壽		
校	二	訓	辰		
時					



志韋拙于頌禱，尤不屑爲夸語浮辭。然則于司徒先輩之六秩慶典應作何言？先生爲誰，先生之事業爲何，人盡知之矣；無可贅言。無已，則願先生之永壽無疆也。人生六十，于古爲稀。而今則否。瞻前顧後，先生之德業如日方中。我校百年大計，尙待先生之擘畫建樹也。先生之爲人也，善愛爲重，事業次之，毀譽又次之，而一身利害非所計。我輩後生當知所服膺矣。六月十六日陸志韋誌，時代理燕大校長職務。

歐美基督教佈道士來華傳教。已逾百載。人數幾達萬人。在此長時期內。此多數人之種種利人工作。對於吾國各種維新步程之發展。供獻殊多。而於教育之改進。裨益尤深。然此中確能充分了解吾國情勢之變遷。以及教育之需要。且能放大眼光。毅然打破舊式教會教育之束縛。力求改善。使其適應中國現代需要之教育者。當屬吾校司徒雷登校務長。在已往二十一年內。先生所有之時間。思想。精力。均係用之於籌備。創設。維持。暨發展燕京大學。母校得有今日在社會上優越之地位。實賴先生之愛力有以成之。際茲司徒校務長六秩榮慶。紹文謹代表全體校友。恭誌數語。以爲之賀。而彰盛德。

燕京大學校友會主席全紹文恭賀

恭祝司徒校務長六十壽詩

舊浦酒釀玉泉香 先生誕辰適值舊曆陽後一日 萬壽山開歲月長 校園近玉泉萬壽兩山山水環繞風景極佳 三派源流環砥柱 燕大於民國八年由北京漢文北通協和
北女子協和三大學合組而成即推 先生主持校務迄今羣情翕然 一園桃李傍宮牆校舍壯麗輝煌由 先生籌畫建築而臨湖軒居男女校舍之中心尤為適宜 已生駿逸材經世
未許鳩扶杖入鄉 先生本上帝救世之心而才足以副之視中外猶一家終年僕僕風塵未遑安處 眼底風波都幻象安然海屋紀滄桑 年來華北風鶴驚而燕大一主編靜決不
因時局有所變遷

薛瀛伯未定稿

慶祝司徒校務長六十壽辰

學生自治會

司徒雷登先生是本校的創辦者，歷任本校校長校務長等職，十餘年來，苦口婆心，慘淡經營，把本校於短短的時光中發展到這步田地，今日燕京大學能夠在全國學府中居最高地位，我們數千學子能夠享受到這樣的教育機會，都是司徒雷登先生所賜，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六十壽辰的紀念，我們受過司徒先生恩惠的人，尤其是正在學校裏修業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種熱烈的慶祝。

司徒雷登先生六秩壽慶

當代儒宗著義樂育

西瀛人瑞松柏長榮

雷嗣尙敬祝

司徒先生造福青年，這當然是我們慶祝的一個道理，但我們之所以慶祝司徒先生，絕不是僅僅因為以此。我們之慶祝司徒先生，除了因為司徒先生造福於有許多勝過外人的地方，但在做事的毅力上却是很差。今日國家之不能振作，青年人沒有做事的毅力，確是一部分的原因。中國人固這一點的好處，剛好是我們所急要學的。據人調查，燕大的畢業同學，在社會上服務都能埋頭苦幹，這大約是受了司徒先生的影響。司徒先生家居簡單，無妻子，不積蓄，除了燕京大學以外，沒有他的所謂財產。這與一般假公濟私的官僚，及學閥相比較，不能不叫我們欽佩。中國人自私的劣根性實在太不成話，各大學所用之款，大都有燕京大學二倍以上，但所做出的成績，却不見得比燕大強，這是何故？自私的劣根性之故也。本來家醜不可外揚，但中國人的自私劣根性，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我們青年人正當知道此種毛病而努力加以革除，司徒先生正好是我們的好模範，我們應當學他。

司徒先生的思想，不一定和我們每一個的中國青年人完全一致，因為中國青年人的思想，壓根兒也不見得能一致。我們儘可以不同意他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確是我們每一個青年人所佩服的，他的人生態度，確是我們所須效法的。這使我們在他六十壽辰的時候，不能不欣喜的表示出誠摯的慶祝。

司徒先生自幼在中國生長。據他說他之所以要創辦學校完全是因爲愛護中國，要爲中國培植人才。今日國難方殷，在司徒先生六十壽辰紀念之日，我們除慶祝司徒先生康健，永遠爲中國培植有用的人才以外，更望同學們能努力救亡工作，爲國家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方不負司徒先生愛護中國的初衷。

特約論著

教會大學辦學之困難

劉廷芳

——司徒雷登，困難之征服者——

——司徒雷登，現在仍在困難中掙扎者——

辦大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這是有常識者所能共見，然而實際上之困難，却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在中國辦國立與公立大學，有它的特殊困難，非辦私立大學者所能了解，然而辦私立大學之困難，却非國立與公立大學所能企想得到。在中國辦教會所創立之大學，困難更多了。本文不希望將教會創立之私立大學所經之困難說得盡量無遺，掛一漏萬是意中事，且各教會大學之始基，差不多都由小學中學為起點，逐漸演進，向來其始基是在前清末季，閉關自守，不知世界大勢，更不知現代教育為何物之環境中奠成，當時仇洋之念，頑固之態度，有非今日所能夢想所及者，凡此開創時期之困難，本文亦不討論。本文試述目前教會私立大學的困難，以燕京大學的經驗為底，所陳述之困難，是各教會大學所共有，燕京雖有它獨有之特殊困難，然這些特殊困難，亦不過是公共困難之一部份，為局部環境與人物所加重的。

辦教會私立大學的困難，可由人才，經濟，組織，政策，關係，五方面看。

人才可由行政人員，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學生。

經濟可由設備費，經常費，特別費，基金，募集，開支，保管。

組織可由校內組織，董事會，託事部。

政策可由辦學宗旨，發展方面，學術程度，學風。

關係可由政府，人民，國際，教會，學術界，校友。「才難」本來是一個到處皆同的問題，中國教會大學之人才問題特別的困難，可分三方面看：

第一先言辦事之才，即行政人員。

教會大學在行政方面有四種成績。

(1)用人少，(2)用錢少，(3)辦事認真，(4)效率高。其中之困難却因此不小。

(一)因用人少，各人之職務便很重，往往一人須做數人之事，特別是初期。有幾個忠于學校之人，應臨時之需要，幾乎無事不做。

(二)用錢少不能多用，書記與助理，為數太少，有職員任事數年，不得一書記與助理者，其苦况可想而知。

(三)辦事認真，審覈必嚴，更換必勤。既無高薪給，初來者必係尋常之人，初期似乎是來受訓練，得到訓練，有相當程度，無相當薪給，可以留得住，便另赴高就，結果是所用的，常是新出場而未經訓練的人，主任者便覺非常勞頓。

在這種狀況之下，行政人才所受的有五種影響：

(一)當局為辦事便利起見，有趨向喜用年輕力強，肯順從命令之人，不知不覺中，造就出來的多是「買辦」式的人員。

(二)有了經歷，自己有主張的人，在這種環境裏，會在不知不覺中，受當局之不滿意與同事之嫉妒，不受在上者之遺棄，便受同

事者之排擠，漸漸失了相當的地位，或離校他適。

(三)對於學校與辦教育或宗教有相當熱心的人，甘苦耐勞，勉強應付，必致心力交瘁，或至灰心。

(四)或善於辭令者，或強于爭取者，於稍有款項時，可爭得書記與助手，其他只能忍苦獨幹，結果是事工難易不平等，造成同事中彼此的不諒解。

(五)辦事人員，既非素來與教育界，及社會有來往之人，在這種環境之中，又無從與社會發生相當關係，結果是眼光如豆，對於社會問題，心日近視，不出校牆。

這五點是教會大學行政向來之困難，並且造成來日之困難，因為這些困難，與其他困難相合，使教會大學本身，永不能產生能獨立，負得起責任的行政人員來。

第二學問的人才，作研究學問的工夫，是大學中主要的人才，得這樣的人才不易，用這樣的人才，比辦事的人才更難。

(一)因為要用人才少，經費省，效率高，各人的事便忙，有希望成功的人才，不得充分時間漸漸的在學問一方面，得着按部就班的成熟，或越等而做，本來不能勝任的工作，或被初等機械式的工作所困，不得自由前進。

(二)間有專長之才，在這種同事之中，便有自命不凡，睥睨同人之態度，從此招同事之怨恨與妬忌，結果是站不住。

(三)為經費之限制，設備不會充足，在學問欲有為之人，往往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在他處，可得較美的設備，以了他用功之宿願，便自動的去了。

(四)在這種環境之中，有志學問之年輕教員，要勇往直前，作探險之試驗，會被所謂老成持重者所不滿意，借故排擠之。

第三教訓的人才，學問之才不盡是教訓之才，學識優深者，往

往竟是第三四流之教訓人才。或因缺乏口才，或因未曾研究教授方法，或因未曾經過相當訓練。知而不能教的學者，到處不少。這樣的學者，對於學校自有其相當的貢獻，但除却研究生外，一般本科學生，是得不着他們所需要的教與訓。教會大學是祇講究教訓工作的，然而因為

(一)經費少，往往要人兼辦事，研究，與教訓三者合一，果結長所之處，不得發展，所短之處，因而彌彰。

(二)教授之鐘點繁重，預備之時間不足，無以盡其才。

(三)雖非行政人員，而許多職務由委員會辦理，差不多稍有才力之教員，都被牽拉入委員會，時間精力因此常感不足。

上述幾種困難，還不是根本的困難，教會大學對於人才問題的困難，却是它的背景。

教會大學的創辦人，是西教士，從中小學的基礎造起，便是西人為主幹，及至成了大學，當然是西人為主。

教會大學從前所有之教授，差不多都是西人，華人幾等於零，這是有三個原因：

(1)現代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當時很少，求之不得。

(2)聘任教員時，以是否基督徒為各標準中之一，非信徒不能為教授。

(3)等到後來，人才可以求得之時，教會大學之待遇，與前途之希望，不及國立與公立學校之教授，因此有機會他去者，便他就而不留了。

結果是教會大學中，總是以西人為主。

西人在大學中為教員，是教會的差會所派遣之宣教師，他們是應付外邦佈道之徵募而來的，雖然多數是大學畢業生，然而對於某種學科有何精深研究，是無保障的。其中碩學之士間亦有之，然

而多半祇合作助教，合大學教授資格者很少，在初期，他們根本是為做大學教授而來的。

然而因為肯來華為宜教師的人不多，這種為教會學校的教授也不易得，學校當局，只得將就，用非所學，勉強應付者不少，被這種環境逼成，求得學問而成為良教師者，也有其人，如某物理教授，是神學士出身，指派教物理，竟成爲一等教師，對於物理在中國環境中之應用，有可觀的成績。

這種宜教師式的教授們，與當初中國人才相比，不能說是在中國人才之下，因為中國大學教授人才，當時並沒有。然而在這種狀況之下，這種西教授們，免不了墮入自滿的試誘，一方面非意識中看不起中國人才，一方面自己也不努力上進。

在心理上這種教員是最難與人合作的，因為他們心中，若不自覺自己的短處，便不會認人家的長處，不會與有才者謙恭合作。心中覺得自己的短處者，努力在例假年中求點學問，無論有無深造，心中有非意識的作用，只怕自己不如人，遇有才勝於己者，不知不覺中厭惡之，借端排擠之。

要改造大學時，這種教授是最難應付的人，將他們更動是很不容易，因為他們年限資格已深，他們又是代表他們的教會。更換了他們，換來的也不見得比他好，也許更動了他們，所代表的教會不再派人來，便缺乏一位教授了。並且經濟是隨着人走，人去了，那一個人的薪俸也不來了。

得才很難，得了人才要他們合作是更困難。

教會大學，尤其是數宗派的教會合辦的大學，數大學合併改組之大學，合作問題更困難了。不了解合作的困難，是不會了解教會大學整個問題的。

如燕京大學的一個學校，合作的困難，可分三方面看：

第一是西人自己合作的困難：

(一)西人中有英，美，歐洲大陸三種人才，美國人居多數。他們的背景不同，思想觀點生活起居都是不同。往往這一切，都在校務上發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西人中所隸屬的教會宗派不同。合辦之教會如燕京原來有四個，然而全校西人所代表之教會宗派，却不下十餘種，信仰習慣行爲標準，都有差別，這些差別，在對人態度，及學生訓育方面都有影響。例如可否吸紙烟，可否在星期日打球，可否受軍事訓練，可否演劇，都成爲很費時間，很費唇舌討論的問題，有時竟因爲爭執而生歧視惡感的萌芽。

(三)各西人代表一個宗派的差會，該差會在中國所辦的事業，尤其是與大學有關的事業，各有相當的成績，這些成績，自然要負愛護之責。這種愛護，有時會引起紛爭。

(四)各差會有自己服務的範圍，與其相關之私益，這些私益，不是私人的私益，是爲了服務的發展，必須有的私益，這種利益，代表各差會的西人，自應當看顧。這種看顧，有時也會引起紛爭。

(五)其中也有教育主張本來不相同的，如女教士中，至今分爲兩派，一派主張當有女子大學，不主張男女同校，堅持女子大學，有其特殊的使命，不是男女同校的大學所能盡的，一派主張男女可同校。燕大原來是兩個男子大學，一個女子大學，一個神學院四校合併而成的。女子大學歸併合組以後，依舊主張保存它種種獨立的特點，行政上曾經過若干的困難，有時是不可言喻的。

第二方面是中西合作的困難，

(一)中西合作的困難，因爲中西人士，生活習尚背景的不同。華教授中久居外洋的留學生，對於西教授是有相當的了解，然而出洋一二年者，其了解之困難依舊不少。西教授中有在華多年者，也

有生長在華者，對於華人的習尚，有的比從他處來的年輕的華人，了解更深，然而往往知識上的了解是有餘，而情感上的了解依舊不足，因為他們的觀點雖可易地而處，到了行事時，不知不覺的又依西洋態度去行了。若到了利害相關之處，雖是賢德之士，也不免失去了態度的平衡。

(二) 西人，尤其是美國人，對於辦事上祇講效率，這態度是很好的，然而未免要推行到許多其他關係上去，生活實際上都免不了用公事房的格式去應付，有時使講而子，重人情的華人十分難堪。

(三) 華人就是曾經出洋留學的教授們，有些也不慣商業化之效率方式與待遇，而少數十足洋化之華人，又在西人前求自己效率的聲望，有推波助瀾之傾向，結果是引起反感，使華人更不願意現代化。

(四) 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人之弱點，最易流露，華人往往對西人謙讓，對本國同胞苛刻，有時竟為挖苦。

(五) 西人之短處是直言傷情，華人的短處是不願出頭奮鬥，背後却喜挑撥。看風勢決定行動，這樣自顧而不恤他人，吃虧常然是中國人，西人也因此而養成獨行獨斷的嬌習了。

(六) 華人對於自己的打算，太用工夫，對於公益的事，太不肯管閒事，結果是會鬧事的，努力服務的是西人，不是華人。事權便多落在西人手中了。

中西合作之難，根本上還是因為中西之間不平等，這不平等是歷史與環境所演成的。

(一) 初期時教會中學之中西教職員之才力，是不平等。西人一方面都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才，而華人一方面，都多半不及他們。
(二) 華人中當時才力優者，現代化之經驗却又不足，在現代教育的立場上，兩相比較，是不平等的。

(三) 西人因為是代表捐款之差會，他們對於學校經濟的貢獻，自然是大，華人除却了少數的捐款外，經濟的貢獻很少，常在分利而不生利之地位，自然與西人不平等。

(四) 因此學校對於華人之待遇也不平等。西人的薪俸，是依西洋生活程度計算，求其足設謹慎儉省之需，由他們返國後的程度計算，自然是算低，然而與華人所得的相比，優得多了。

(五) 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便發生兩種很壞的影響：在華人方面，不願意努力，祇做到足數交代，便為已足。不肯在工作上之量與質上與西人平等。

(六) 不平等的待遇，在西人一方面的影響，是造成一種不平等的態度，西人在不知不覺中自以為高於華人，而蔑視華人，久而久之，有「他是華人，何必這樣待遇」的態度。

(七) 西人並且容易取施主的態度，華人造成倚賴的習慣，華人也有引西人以自重，驕其同胞。西人也有藉管賬的勢力，利用華人供自己的驅遣。

這不平等現狀，使教會所辦的大學，與其他西人在華所設之機關相似，西人時常佔優越地位，受媚，聽讒，使華人之卑鄙者逢迎其短處，成為極大的試誘，到如今雖在已改善的學校，華人能與西人親密者，仍在諸多事情上佔便宜。

打破這種不平等之思想與觀點，是一件極困難的工作。

第四關於學生

從前教會大學的學生，有兩種特殊現象

(1) 學生的出身。他們多半是由教會所辦的中等學校裏來的，或者是大學所附設的，或大學本身的前身，後來成為大學預科中來的。

(2) 學生的費用，不少是由學校或教會供給的。免費生，減費生，在全體學生中成為重要的部份。

這樣的學生，有他們自己一種特殊的心理：

(一)他們感激西人與教會的資助，對於西人取恭順服從之態度，乏獨立的精神。

(二)他們已經由習慣而成自然，許多事情，倚賴西人，以為取用享受，是份所當然。

(三)有些造成一種反抗心理，希望一時經濟困難的屈服迅速過去，有所謂「文憑到手，宗教變狗」的態度。

(四)在非教會培植，西人資助的子弟，對於這些人，又取一種暗中蔑視之態度。

凡此一切，都使學校中訓育的工作，不易在常態中進行，收當收之效果，一旦有變故，易受人煽惑，被人利用，都可以做為導火線，使大局亂到不可收拾。民十三至五六之間，反教運動，與南方毀校之行動，都是極好的証例。

要將這一切舊規更改，不使失惠者怨望，同時又不使應得資助，好學而貧寒子弟，失去了求學之機會，又不使有培養信徒之子女的善男信女起誤會，消滅對學生之熱心，這都是困難的。最困難的是改造華人倚賴的心理。

【經濟】

經濟之困難，是辦學者且夕不離的問題，教會大學的經濟，表面上歷年來都是穩固充足，其實比中國人自辦之學校，困難不知多少倍。

(一)教會辦學校是用宣教之款辦。在母會之國中徵集捐款時，無論是為施醫事業，或為教育工作，都是與佈道工作同一源流，就是奉教的信徒之常年捐，或月捐，或每星期捐，或特別捐，其所以能維持經久，即在於此。爲了這緣故，教會辦學校，若拋棄宣佈基督福音的原旨，是要發生種種困難的。

(二)反教運動，廢除宗教必修科，禮拜儀式參加的自由，凡此種種，都要使捐款者灰心，非經一番改換觀點之工夫，是不容易維持原有捐款者之熱心。

(三)特別捐款，可由各種基金團體徵募，惟此種團體爲數有限，所求之學校又多，所得不能多，並且有年期之限定。

(四)個人特別捐款，喜捐作建築之用，以作親友之紀念，不願捐做基金，或常年經費。

(五)各種捐款，多由捐助者指定用途，學校接受捐款，同時須接受本人所規定的用途，因此教會大學的歲入，不若國立學校之款，可以整個由學校當局支配，倘若某人捐款爲校園佈景，便祇可用在佈景一方面，圖書館雖有購置圖書之急需，也不能通融轉撥移用的。

(六)有些捐款，是隨人來往的。某處教會對於某教員有相當關係，願捐款資助他的俸給，若他離校，捐款亦即停止。西國教員由差會派遣，所派遣之人，因故不來，便無形中減少了若干捐款，學校預算中便少一筆收入。

(七)近來教會中的教士，對於社會經濟之觀念，亦有更改之趨向，教會一方面，亦有許多宣教師反對資本主義，因此惹起資本家仇視教會，仇視差會之觀念，捐款因此而減少。

(八)在華之西商，往往因行爲生活上不合宗教道德，爲西教士所不滿，因而兩相齟齬，他們返國時，對於西教士之工作，不免要作反宣傳，捐款因此也有受影響。

(九)近來西國教會中，對於捐款資助差會至外邦宣教，漸漸取一種與前不同之態度，曾經作大規模之研究調查，這些調查的報告，所主張的是一種新宣教的宗旨與方針，根本上是很好的，然而提倡新觀念時，他們免不了對於現在的宣教差會的政策與工作，下

許多不滿意的批評，一般教會中的信徒，對於新的觀念，不甚了解，對於舊的批評，却容易明瞭，藉口減少他們的捐款。

(十)有一部份熱心捐款的信徒，主張在中國宣教的工作，捐助已久，中國信徒當努力自主，作每年減少西國來的資助若干，逐年遞減，以至完全獨立為止，惟中國教會經濟程度相差太遠，除却少數的教會早籌自立，能逐漸被減而不致停頓外，大多數因外來助款，一經減少，便覺十分困難，有不能維持之隱狀，中學小學已十分勉強，至於大學則毫無辦法。

(十一)世界大戰之後，英美各國營業，與個人之所得稅，與遺產稅，逐漸增高，使有力捐款者，到了無力之地步。從前之遺產捐款等，往後日難一日，不容易得了。

(十二)美國人為慈善捐款最熱心者，然近來美國社會上漸漸有主張一切慈善事業，不應該賴私人捐助，當由地方及國家負擔，增加富人之納稅，用在慈善之專業上。這種辦法，最吃虧的是外邦宣教差會所辦之學校與醫院，因為富人自捐，可勸他捐助外邦之慈善事業，國家與地方之稅收，不能移用外邦去了。

(十三)近數年來之不景氣影響，美國極大失業者的增加，到處需助，商業者之失敗，富而熱心者，一旦化為不能維持生活之人，自顧不暇，何以捐助他人？

(十四)在這時期中，雖有多數人受不景氣之影響，亦有隨機遇，隨新運，而成爲新富者，然這些新富之人，已非舊時教會中訓練出來之人，對於慈善事業，尤其是教會所辦之慈善事業，不肯熱心捐助。他們不了解教會，更不了解教會在外邦佈道事業，更不了解爲何捐款資助數萬里外素不相識之人，得教育之利益。

(十五)藉西國捐款在中國辦大學，必受外滙所控制，在現今外滙不穩定之時，預算極不易做，負責者，時刻縈心，確有今日不知

明日之焦慮。

(十六)在國外募集之基金，可以轉在外匯優勝時，匯至中國生息，可以兩佔便宜，然而中國年來政局之欠穩定，外侮之頻臨，投資實是難事。西國捐款者不願意，託事部也不願意，將基金匯至中國投資，是意料中事。

(十七)在中國募捐是十分困難，有力者不願意或是不敢，或是未有捐資興學之習慣，燕京募建築費所得五百餘萬元，中國不過十餘萬，全部建築祇有宿舍一樓，與大學之門及塔而已，百萬基金運動，至今不過三十萬，而學校在國外所募集之基金，在六百餘萬之上。

(十八)大學之常年經費，只是有增無已，因學校建築與設備，設置了以後，須年年修理，維持，及添補，正如一個兒童日在發長，衣衫不能不年年改作的。

在這十八種條件之下，經濟之困難，真不是簡單！

【組織】一方面的困難

校內組織——
教會大學締造之艱難，初期自然事事因陋就簡，校內組織亦是如此，與其他等校所不同處，最重要的是：

教會大學是西人，差會的西人爲主體，他們在華工作的組織，是以差會爲單位，在差會之中，大家受同等之待遇，依需要而定最低之同等俸給，同居一個場合之內，生活求簡單，彼此互助，別有一個世界，是一個入世之出家人之集團。因此他們辦大學時，校內組織也是根據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組織有兩點好處：

1 學校如同一個大家庭，各教員之家眷都是來往相親，互助的精神是很好。

2 這樣的精神，影響學生的生活不少，並且是好的影響，因爲

學生每得機會到教員家庭裏去，課外多得與教員接近。

然而這種組織有他的短處，便是在學術上的等級制度不易嚴格的規定，張三李四初從大學畢業來到中國，也許便會是教授，因親密平等，用在學問制度上便不適合了。

華人從前因上文所述各種經濟及其他困難，不容易發展。

改革要定等級，升降，加減薪水，用冷冰冰的治校方法，去打破熱熱羶羶情感的差會集團，這是教會組織中的革命。

立案以後之組織，事事須合部章，把這種親密團體之關係摧毀了不少，負責作這種改革之人，其固執可想而知了。

從前西教授係差會派遣，在改革了以後的制度之下，便由學校選聘。華教授之選聘，亦由學校決定，這又是與教會一方面很難應付的一點。

教授治校，或領袖獨裁，經濟之權由誰操持，這種種問題，都是含着極大困難的。

董事會與託事部

教會大學本來，在華有董事會，在美有託事部。在美之託事部，授權在華之董事會處置一切校務，惟經濟預算，選聘校長及教授，必須得託事部之最後同意。

董事會會員向來是各差會在中國之宣教師，差不多全是西人。間有一二華人，也全無實權，到會做「橡皮印」而已。

要將這樣的董事會改革了，增加華人，華人又須佔多數，使各差會不覺得剝奪他們應有的權利，而依舊保全他們對於學校的信心。又要使美之託事部能信任改組以後之董事會。

在美之託事部，是由各差會之幹事與代表所組成，他們的眼光，觀念，也都是專為教會與差會，如能將他們改組了，使多有遠大眼光之人了解中國情形，世界大勢之人。能了解中國董事會之各

種建議，而允許各種隨時改革之進行。

凡此一切，都是很大的困難。

【政策】上所遇見之困難：

第一，辦學宗旨之改變 教會在中國工作與事業的計劃中，本來是沒有創辦大學的計劃。雖然辦學校，開通民智，是教會工作連帶之事。數十年前，西方教會之信仰，多半是被出世派，注重來世觀者，所控制的。社會福音，僅為很少數的人所注意。一切對於社會的服務，不過是暫時治標的，並不是注重治本的改造。但基督教入中國以後，環境一切，漸漸的差不多強迫有智識的宣教士，去做種種改良社會的服務。教育事業，便在教會事工範圍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從小學以至大學，差不多一步步是被時勢的需要所逼進。然而一切的計劃，都包含着三種重要的特點：

(一) 學校制度與組織，是抄襲宣教師本國的學校為樣本。英國人辦中學，總要想辦得像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美國人辦中學，總要想辦得像美國的「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美國人辦大學呢，總要想辦得像美國的私立大學，尤其是像美國教會的私立大學。

(二) 辦中小學，無需得任何方面的許可狀；辦大學，因為要給與學位，必得向政府註冊，取得給與學位的許可證。美國各州，各自有給與辦大學許可證之權；教會在美國，由差會一方面組織董事會，在差會的總會所在地，呈請州政府註冊，便能得到許可狀；因此，在中國的教會學校，能在中國給與美國的學位。

(三) 教會所辦的大學，既然是教會差會負責經營，其政策便時時與教會的差會政策互相表裏。教會大學是差會的所有物，是差會工作的一部份，是差會負擔的一部份，是佈道工作的一部份，是美國教會組織上的一部份。

然而差會不是中國的教會。差會的性質是暫時的。照理論上說，差會是西方教會特派宣傳與進行一種使命的一種臨時團體，其所負的使命完成之後，當然無存在的理由。因此教會大學原來的計劃是有三樣特點：(1)外國式的，(2)根在外國的，(3)是西國教會的一部份。這樣的學校，他的政策，自然是暫時的。辦學宗旨，是宣傳基督教福音的。

要把這樣的學校的政策與宗旨改造過，使它成爲(1)合於中國式的，(2)成爲中國教育系統中的一部份，(3)使它脫離西國教會的管束，使它成爲中國教會的事業，(4)使它的根，移到中國，能深而且固，(5)從差會暫時的使命，變爲中國國本上有關的永久的事業。要促成這樣的變化，其中的困難，可想而知；並不是一番法令，幾句口號，便能成功的；其中必須經過幾許的交涉，幾許的周折，無數的懷疑，大量的討論，無數的試驗，多次的失敗，與再試的决心，纔能在實際上改變過來。

第二，發展經程方向之指導。照原來的宗旨，發展的經程，是積極的趨向美國式的私立大學。原來的宗旨不變更，其發展經程，可由美國教會大學已往的發展程序，推測將來，而指導的方法，也有所依憑。若原來的宗旨一經改變，發展的經程，便不免因此呈錯亂之象。前途既不易推測，也無所依憑，指導因此十分困難。教會大學最近十年來發展經程的方向幾經變更，喚起教會中激烈之爭論，與學校中很費時間的攷慮。

第三，學術程度之確定。教會大學，在學術程度一方面，向來有五種主要的困難：

(一)從創立者與維持者的眼光中看，大學首要的任務，是爲中國基督教教會服務。教會的服務，是以平民爲主的，因此，所授的學科程度，不在高深，而在應用。

(二)辦大學的宣教師，三十年前，分爲兩派：一派是主張注重西文，這一派在華北居多，因此，華北的教會大學與中學，以注重西文者爲多；一派主張注重西文，這一派在南方居多，因此，南方的教會大學與中學，其英文程度，平均比北方的教會大學與中學高得多。

(三)無論是否注重英文，國文程度，都不高明。

(四)除却了在教會服務，在學校做教員，與預備爲醫師，三種職業以外，很少其他職業的訓練。

(五)研究高深學術，幾乎不在範圍之內，因爲，既無這樣的設備，也無這樣訓練的師資。

從這五點看來，便可知，要將原來的教會大學，改爲「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材」的，真正中國的大學，不是容易的工作。

在北方辦教會大學，只要提高英文程度，改善國文程度，兩個問題，就都困難了。

教會學校入學考試，向來是主嚴格的。但是，近數年來，因爲國立學校的發展，所給與學生的機會，與前程的希望，使投考大學的學生，先求考入一二著名之國立大學。教會學校，無論如何辦得好，在這一點上，總是吃虧，不能得着首選的人材，只能得着次選的人材。不過因爲入學考試嚴，入學後試驗中淘汰又嚴，整個學生全體平均的程度，與國立大學比較，有過無不及。但是，教會大學所造就者却是中材，下愚雖能免，上智却不能多得。這是前途學術標準的一個很大的困難問題。

第四，關於學風的保持。教會大學，從開辦以來，無論程度高低，教員却能認真工作，學生也是勤學。這勤學的學風的養成，是有可觀的成績。功課有計劃，依期開學，按期完工，考試認真，這

都是人人所共知的。年來雖經過許多時局的變遷，在各種困難的環境之下，教會學校，仍能保持勤學的學風。以後時局變遷多端，是否能允許，仍舊繼續保持以前的學風，也許要成爲一個困難的問題。

還有一點，向來教會學校，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所教授的，僅是初步的學識，又無直接參加政治的關係與活動，因此學生大概是穩健，安定的。近年來，政治設系，社會問題，也有積極的研討，學生與教職員，也漸漸與政治發生關係。是否將來能保持從前的狀態，不爲政治所捲入旋渦，與國立大學，受同樣的影響，亦是一種難決的問題，其中也不無相當的困難。

教會大學，以極有限的經濟，作嚴格的訓練，其服務之對象——學生——能收容的人數，亦有詳細致慮的必要。雖然投考的人數，年年加增，所錄取的人數，幾乎年年成爲學校中考慮的難題。因爲要維持學風，提高程度，教會大學的人材與設備，都是有限，不能作無限制的貢獻。因此，決定學額之多少，便是當前一種很困難的問題；因爲附帶的關係太複雜了。

〔關係〕上所遇見之困難：

第一，對於政府的關係。二十年前，中國政府對於教會大學，取放任的政策，不加注意。教會學校，能依照原來的宗旨與計劃，按時進行。雖有種種的缺點，却逐步整齊，精神充實，自從政府積極履行立案規程以後，教會大學，在種種困難情形之下，先後立案，努力服從政府法令，這是教會大學的進步。在國家教育系統中，已佔有它相當的地位。然而教會大學，不僅在進行立案經程之中，遇見許多困難，就是在立案以後，仍有許多困難：

(一)宗教自由的限制，宗教雖然自由，但不能如從前一樣，作積極的進行；宗教功課，不能成學系。數年來且不時有妨礙宗教生

活的臨時法令。這是給與教會大學一種精神上的大打擊。教會大學的創立，維持與發展，宗教的精神，是它根本的力量源頭，若這源頭上有所虧損；教會學校前途，必生極大困難的。

(二)年來中國國家教育法令，一方面是在初期建設之中，一方面是在國家多難，轉變極繁之經程中，因此多半是試驗性的，因時制宜的。這種法令，只好用中國人向來的態度，相機奉行辦理。在教會大學中，便成爲很困難的問題。因爲教會大學中，無論行政執行會議，或教務會議，都有西教授參加，他們對於國家的法令，是取西洋民治國人民的態度的。對於每種法令，都必依照良心與信仰上的主張，加以一番致慮，認爲對於信仰與良心不相背馳的，必嚴格的奉行，不贊成通融辦理，更不肯陽奉陰違。譬如，學曆的規定，課程的組織等等，有許多不成問題的問題，一到教會大學，便成問題了。又譬如軍訓，有些西教士因爲他自己的信仰，是主張絕對和平，在他本國，也不參加戰爭，並且反對軍事訓練的。因此覺得來做一個宣傳和平使者，而辦學校，使青年人得軍事的訓練，未免矛盾。這些教授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另有一部份西人，他們是不反對軍事訓練，但覺得背負木鎗，有名無實的軍事訓練，是一種耗費時間的無聊舉動，既不能嚴格給與有名有實的軍事訓練，就是，能用軍器殺人禦敵，却稱爲軍事訓練，是會在學生心中造成一種藐視法令之態度，於其餘學課，不無影響。行之太久，要於這熱烈的討論。此種困難，恐怕在現在國家狀況之下，是免不了的。教會學校當局應付的困難，非其他學校，所能料想得到的。

第二，對於中國人民的關係。教會大學，在中國存立的理由：(1)是因爲當初人民需要先鋒的創作，(2)是因爲國立學校未發達，(3)是因爲歷年來國立學校因政局的變動，未能循軌蹈距的進

行，教會學校，在特殊狀況之下，有相當之貢獻。(4)是因爲中國人民之衆多，現有大學，不能供應所求，教會大學，可彌補其不足。然這些理由，是暫時的，以後除非教會學校，能有特殊貢獻，是否應當存在，不免成爲一個疑問。

然而我們相信除非教會大學，能設成爲一種真正對於中華民國有切實服務的貢獻，合他們的需要，滿他們的希望，不求特殊的保護，與人民同甘苦，同冒險，遵守政府的法令，便不能有長久存在的可能。

要使教會大學達到這樣的程度，得人民的瞭解與信任，這是當然不容易的問題。其中的困難，未免要與時俱增的，除非積極前進，站在時代的前頭。

第三，對於學術界的關係，教會學校，從前與其他教會的事業相同，有『閉門造車』的傾向，辦教育之人，幾乎自成一團體，與學術界的接洽交往，是很有限的。數年來，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是很可觀了。教會學校，在這學術界中雖也有相當的地位，然而除非積極前進，超出向來困守在初級工作之外，使各教授得由教課以外之餘暇，去從事高深學術之研究；除非能增加設備，使學者能有合式研究的工具，恐怕教會大學。在學術界的地位，要漸漸落人之後，對於國立大學，也許到了望塵莫及的地步。這是當前一個嚴重的問題。其困難不僅在經濟一方面而已。

第四，對於教會的關係，教會大學，是教會所創辦的，是教會所維持的，是教會所發展的。若沒有教會，便沒有教會大學。若教會大學與教會斷絕了關係，它的衰敗，是可預料的，或許竟至於消滅，亦未可知。從學校的立場看，如何能設依據教育的原則，向前發展，同時又能保全教會創辦人的原來宗旨，與維持者的苦心孤詣，既不忘本，又能自由，使宗教博愛犧牲的精神，永遠保存，爲

教育人材的骨幹，使所造就出來的人材，能繼續發揮這樣的精神，而廣大之，使中華國民，從教會學校，吸收宗教之優點，使學校能作切實的教育貢獻。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最困難的。教會學校，倘若在這一點上失敗，則徒有軀殼，失去靈魂了，在中國教育系統上，決無存在的必要。

第五，對於國際上的關係，教會大學，在中國國交上很有可值得注意的貢獻：

(一)教會因爲有大學，年年的發展與進行，與西國教育界與學術界的人物。發生關係，引起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注意。

(二)教會大學在國外的募捐，造成若干對於中國問題，發生興趣之小團體。這些團體中間的人，並不是一定有學問的，然而不少在社會上有責任的人；因爲他們幫助教會大學在中國的工作，遂使他們養成一種關心中國時局的習慣。教會大學，爲本身的宣傳，不得不爲中國作改好的宣傳，有希望的宣傳。

(三)教會大學，爲謀求事業的發展，年來與國外許多大學與其他學術團體，發生關係，如與哈佛，普仁斯敦，耶魯，賓塞萬尼，及其他各大學，有種種的合作。這都是使中國在國際上得着利益的。(四)在中國辦大學的西人，有成績的，往往能引起彼邦政治當局的重視，對於中國時事，每徵求他們的意見。這也是在邦交上無小補。

從這些舉例，與其他方面看來，教會大學在國際上，是有它的地位，因爲它對於中國及其他有關係的國家，能作相當的貢獻。然而今後教會大學逐漸由西人手中，移交華人辦理，能否繼續作這樣的貢獻，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因爲它在國際上，能增進中國與有關係的國家中間的友誼，因此，與中國爲敵的國家，是取嫉妒與厭惡的態度，有

必欲得而甘心之意。在國難嚴重之長途上，教會大學，免不了要遇見若干困難。在杞憂之心中，似乎無疑問的。

第六，對於畢業生的關係，教會大學是私立大學。私立大學的經濟責任，與發展，維持的義務，無疑問的，應當由它自己的子女負起來。美國私立大學的發達，畢業生的功勞最大。有幾個教會大學，在中國，已經向這一方面進行，也已經得有相當的成績。然而年齡比較幼稚一點的大學，畢業生進了社會，人數既少，經驗又淺，對於母校，有愛莫能助之困難。雖然如此，倘若教會大學與它的畢業生，能造成相當的關係，使畢業生能有愛護母校的深情，這不過是時間長短的問題，前途是有希望的。

在這一方面看，不得不想到畢業生出路的問題。現在大學畢業生，到處感着失業的痛苦。有的不配說是失業，因為畢業之後，從未得着相當的職業。在這種狀況之下，教會大學之畢業生，比較起來，還算不差。譬如燕京大學二十三年度與二十四年度的畢業生，共有二百二十餘人，失業者不過五人，祇佔百分之二，這是差可自慰的。但是，其中却有三點，引起我們的注意：

(一)這二百二十餘人，得着職業，大多數是由自己家庭父兄親友的介绍，由學校介绍的為數很少。

(二)這二百二十餘人，所就的職業，各界都有，然而最多數，是在學校做教員。

(三)在這許多做教員的畢業生之中，其服務的學校，大多數是教會的中學。

這三點是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一)他們得着職業，雖然是因為他們從教會大學所得的學問，有相當的價值，然而，他們得到職業，也是因為他們是從比較有地位的家庭出來，(二)他們還未能在教會學校之外，開闢出來新的途徑。這都是教會

大學行政的當局，所當着手研究，計劃，致慮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第七，對於託事部的關係 自從立案之後，舊有在美國的董事部，改為託事部；原有中國的託事部，改為董事會。在美國的託事部，名義上受董事會之委託，擔負保管基金，投資收息，并募集款項，供給常年經費之責；實際上他們所負的責任是很大，因為中國董事，在現在情形之下，不得他們的幫助，學校便無辦法。因此，當前一個最重大而極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能設法改造現有的董事會，使它成爲一個負得起供給常年經費之責的董事會，不但在遴選校長，審查校務成績上負責任，而能真正擔得起全副經濟責任。除非達到這一步，沒有希望，也沒有權，可以要求託事部，將整個權限移交過來。

司徒雷登——困難之征服者

人才——來時全校教職員男女合計祇三十三人

今日——已增至二百十餘人

四教會代表合作

男女，中西，合作

新舊各派合作

中西教職員平等待遇

經濟——來時祇有二萬五千元常年經費，在東城土堆

中十餘座舊屋，廿萬基金已幾乎在地皮上耗盡

圖書數百本

今日——

設備與建築價值五百餘萬

地皮校址千二百餘畝

基金六百餘萬

圖書卅餘萬冊

政策——來時完全教會的差會的一部份，與中國

政府不生關係

今日——已立案為私立大學，在中國教育系統上有確定的地位。

學術程度——來時在學術界未得人注意

今日——有研究院，教職員在各種國內外學術團體上，有相當的地位與成績。

學風——愛國與勤學在萬難中邁進。

組織——來時男女兩校與宗教學院三部，未曾統一融合。

今日——已成為一澈底男女同校之大學，文理法三學院，研究院，宗教學院，彼此連繫有系統，合政府法令之學府。

董事會——來時完全是以西人為主，並係差會之西人為主，華人幾無插足餘地，其權限也極有限。

今日——完全遵照部章改組，華人多數有充份負

責之機會。

他十八年努力，不避困難，與之肉搏，一步一步的，克服了一大部份，造成教會在中國辦學之新記錄。

司徒雷登——現在仍在困難中掙扎者

基金尙未能供給常年經費。

校中組織尙未能完全穩固。

設備尙未足敷各系之發展，也不敷供高深的研究工作。

究工作。

董事會尙未能負起全部經濟之責。

學風正隨時局轉變之中。

學術程度的改進，正在商酌方向。

在有些人的眼中，西人仍為校中主權所在，中西尙未完全平等。

但是司徒雷登已屆週甲之年了，

十八年來與他共同掙扎奮鬥之同事，也隨流水年華而推移了。

校友們！

母校之前程，看你們如何推進！

校友撰文

今後的母校

陳其田

十八年來母校發展的神速，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凡是蓋甲廠時代的同學，一到海甸來，總能自己體會出來。記得七年前，我第一次踏進校友門的時候，眼看一座一座高大的樓房向汽車後頭飛奔過去，如入夢境。心裏想着，怎麼蓋甲廠那幾間狹小的民房，會變成這麼多的高樓俊閣呢？蓋甲廠那一間汽車房改的圖書館，一搖身便大了十幾倍。八十幾位的同學，也增加十倍了。只有文理科和神科，不分學系的蓋甲廠大學（我入學那一年還沒有名子），變成五個學院（文，理，法，宗教，研究）二十幾個學系，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學。從前男女分校，上課時候，三五個藍衫黑裙的女同學，點綴前排；下課時候，誰也不敢向誰說話。現在男女合校，遊玩，談天，演戲，甚至甚麼「小貓」「小狗」「我愛你」——真是換了一個世界。這幾年來，母校教授和同學在學術上的努力和貢獻，已有相當的成績。顧頡剛先生常說，他很喜欢燕大的環境，因為同事們大家有一種硬幹，苦幹，窮幹的精神。校外有二千多的校友，分散各地服務，到處表現燕大精神，社會上有口皆碑。凡此種種都是慶祝司徒校長六十壽誕，最好的禮物。

歷來司徒校長慘淡經營，幾位「元老」「重臣」竭力襄贊，全體教授和同學，通力合作，才能造成今日的燕大，在全國私立大學中，總算基礎偉大的大學。天下事創始很難，但是守成也不容易。我們希望今後的母校，能夠充分發展，更加光榮，更加偉大。華北政局雖然不穩，不能消滅燕大精神。經費雖然困難，不能動搖燕

大的基礎。母校往那裏去，問題端在行政方面。我們相信司徒校長長的錦囊，妙計多多，可以打開母校第二階段的新局面。對此良辰美景，不禁稱觴敬祝

母校萬歲！

司徒校長萬歲！

燕大校友會萬歲萬萬歲!!!

我所認識的司徒博士

白序之

我崇拜的偉人很多，但大半是去世的古人，活着的，本就不多，而況又是多半未曾會面，可謂識荆緣慳，徒慕其名而已。至於十數年來常其聲歎，觀其形容受其春風化雨於不知不覺之中的，止有司徒雷登博士一人。

他是一位美國人，他的原籍在那裏我可不知道了。大概在幾十年前，當他的父親在中國杭州作傳教士的時候，司徒先生就生在西湖畔的杭州城裏。自幼即與中國人士接近，說中國話，讀中國書；中國的文化，造成了他一部分的人格；中國的山川，陶冶了他大部分的天性；中國的士女，喚起了他對中國人的同情。雖然他年青的時候，也曾回到他祖國，受了高等教育，以及專門教育，可是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降生地杭州，作他父親的餘業。後來又到南京金陵神學作教授，民國九年又到北京，作了燕京大學的校長，或校務長，直到如今。所以他自己也常說，與其說他是美國人，倒不如說他是中國人了。

大概一個偉人，所以成其為偉人的，條件雖然很多，但不外有

這幾種性質；第一：他有健全富有能力的人格；第二：他有超人的遠大的見識；第三：他能成就常人不能成就的事業。古來英雄豪傑成大事業的固不乏人，然每因見識不足，人格有缺，以致一敗塗地者，所在皆是。求其人格，見識，事業圓滿而無虧的，恐怕也就像鳳毛麟角了罷。

在一九一九年的秋天，我開始到盤甲廠燕京大學去讀書。那時候還不叫燕京，低低的門楣上只懸着一幅英文 Peking University 的橫匾。本來這是匯文大學的英文名稱，自從通州協和大學與北京的匯文大學合併而成立，那時所謂燕京大學的前身時，就因為這新校的命名，兩校的學生，無論畢業的與在校的，起了很大的爭執。甚至在校的學生幾乎釀成械鬥，匯文學生主張採用匯文原名，曾一度將「匯文大學」的匾額硬懸起來，協和學生於是大憤，非打下來不可。於是全校起了「護匾」、「搶匾」的大波瀾。不知動了多少調停，磋商，暫時採用了匯文的英文名稱。所以我們那時若有人問起我們在那裏讀書，就頗有煞費躊躇之勢。我再說到校舍，是一個不過二十丈見方的圍牆，裏邊包括一所課室，三行平屋，一所廚房連着飯廳。和一間辦公室而已。學生合計不過百人。教職員不滿二十。門前是一帶車塵馬跡的黑土路，南去五十步，就是高大的城牆，下面流着一溝臭水。在世界大學裏，恐怕無此窮苦簡陋的了。在那時候，又那裏想到在七八年之間，會變為富麗堂皇名聞全國的現在的燕京呢？

在一九二〇年春天一個早晨，十點鐘左右，全校學生照例在飯廳（飯廳是兩用的，吃飯之外還可作禮堂）聚會，屏門開處，走進一位中等身材，廣額削頰，面帶褐色，中年的外國人來，後邊跟着教務長博晨光先生，經他的介紹，我才知道這位面生的外國人，就是我們將來的校長司徒雷登博士，全體不約而同地發生景仰和注意。

靜靜地聽他講話，他說的是官話，口音略帶南方腔調，而操縱純熟。齒頰間且多流露文雅字句和現代的名辭。聲音緩而沉著，低而懇摯，假設閉起眼睛來，就好像有一位我們最親信的朋友，在對着我們講話，熱情篤愛，聲聲透入我們的心坎。那時我最奇怪的是主席未曾詳細地介紹他，而他自己也毫不客氣地，就居然以校長自視，雖然他是初次合我們學生會面，就好像他已作校長很久了。可是也真奇怪，那時全體學生，雖與他是初次相逢，但心目中並未把他當一位舊生客。

在最初的半年，他不常來校，據說他尚未將金陵大學的教職辭掉，到了一九二〇年的秋天，開學的時候，我一進學校的大門，就覺得赫然改觀，英文牌額不見了，代替牠的是「燕京大學」四個斗大的金字，飯廳亦加大了，平屋也加多了一行。並且不遠又添了兩所大院落，學生亦同時加多一倍。又過了一年，學校四週的住宅七零八落地購到三四十處，學生宿舍亦擴充到十院，教員中知名之士亦紛至沓來，於是在這故都荒僻寂寞的一角裏，燕京就在這時奠定了他的穩固的將來的根基。

從一片沙漠地裏建造起一所樂園，從虛無飄渺中，實現出各人的計劃，往貧家茅舍境遇中，在短促時間改變成富室紅樓，確非常人所能辦到的事。世人只知燕大自然發展之易，又那裏知道艱苦卓絕，東西奔走的司徒雷登先生的艱難呢？世人只知中西人士樂善好施之美意，又那裏理會司徒雷登先生偉大人格所感化的功績呢？

司徒雷登先生自擔任這校長的重任以來，曾於一年中兩渡重洋，托鉢海外；又曾於黃沙瀰漫中，走着驛車古道，晉謁陝督陳樹藩，商購其私人花園，作為現在校址。奔波勞頓，迄無寧息。我常常想，他本來是美國人，以他的能力，大可造福於本國社會，我們華人，何厚於彼，他竟為我們中國青年，殫心竭力，謀一完善的高等教育的

所在，却所爲何來？這不能不景仰他的一視同仁，化除國家和種族的畛域的精神，和偉大的魄力。

他平素任勞任怨，事成而不居功，失敗而不灰心。於事無辦法中，他有辦法；於絕望中，他有希望。他的目光沉毅而含着同情；他的態度莊肅而表現着溫柔。全校八百多學生，凡接見他的人，就覺得他藹然可親，而生家人父子之感。

前幾年他遭遇了不幸的事，慈母見背於先，愛妻又因病去世，他獨生一子，又遠在天涯，從此他就孤獨一人，走這人生的路途。然而他並不孤獨，因爲他自己已將他手創的燕京作了愛妻，千百的他栽培出來的學生作他的子女了。

吾所知之司徒雷登博士

許光迪

燕京大學校。乃由三校合成，在匯協兩男校合併時，畢業生各維護其原校名稱，意見不一致，曾演一齣搶校區之武劇，致使一個時期，無有固定適當之校名，只稱爲蓋甲廠大學而已！幸經蔡元培范源濂等教育界同人費盡心思，始定出燕京大學校之校名，我寫此數語，乃顯示當時人爲校名在精神上感覺不安，在校務上人人亦均有熱烈之期待，況當「五四」時代，學生思想昇華，時代更新，若無新領袖，出任艱鉅，何能實現成立燕京之目的？於是校董公決敦請司徒雷登博士辭去南京金陵神學來長母校。

普通願充，樂充，肯充一校之長者，至少在校中須有相當歷史，校中先有人擁護，方能出山而任校長，否則貿然充當，環境亦不許可，司徒博士在前期校史上並無關係，當時學生對博士亦無相當認識，若非有熱烈心情，宏大志願，遠大目光，超越能幹之司徒博士不顧一切，肯來長校，則今日燕大基業，何人肇造！博士一經敦請，慨然北上，殊爲慶事！

司徒博士雖屬美籍，却生于杭州，對於中國文化，造詣極深，華人之優良習氣，陶冶有素，深感援救中華之計，在乎教育革新，故服務中華之良機臨到，不畏艱苦逼迫，毅然來校，其心願乃擬使吾青年以真理，得自由而爲人類服務也！

博士初來燕京，除教授希臘文外，即與校董及教授商討校務挺進之方策，有時召集學生團體，指導諸般活動事宜，學生除稱讚其



門校的代時廠甲廠

華文精通外，尤羨慕其思想新穎，決疑迅速；而其文雅氣度，予學生以一優美印象，自此以後，新燕京精神已胚胎於個人心田矣！彼時辦公室無助手，博士自稿自書，精神矍鑠，博士走路時，首挺胸，兩拳緊握，步履急速，若有要事，即待執行者然。

博士在校外極願訪教育界友好，如蔡子民先生，胡適之先生，

亦常來校參觀並演講，胡適文存中之「不朽」一篇，即來校演講之留稿，博士對於新聞界常與聯絡，召開之新聞聯歡會，雙方印象頗佳，此外對於政軍商紳各界亦有友誼。

當時校中外籍教授概為美國教會所派，在伊等來華多數可謂犧牲，在學生求學方面，有者不能輔導。而華籍教授人位嫌少，啟迪欠周，自博士長校後，漸改辦法，設備上力求完美，不久組織健全，科系全備，人才蔚集，聲譽漸隆，于此不得不歸功於教職員在博士領導下合衷共濟。

自博士長校後，因行政革新，思想明穎，不免招引一部分人忌妬，竟稱之為革命，為叛徒，因是美國一派亦對博士生猜疑，曾聞人言：常博士某次返國，某派人以其准學生讀章爾士之世界史綱也，羣起非難，交相詰問，乃博士據理解說，侃侃談辯，於是疑者悟，惑者解，而返國使命因是反告成功。

司徒博士對學生活動非常熱心，民國十年之燕大月刊社，毫無基金，每月稿件，端賴博士捐款以出版，博士關於其他公益事項，亦常慨應所求，但其家庭用度却甚節儉，司徒太夫人已屆八十高齡，出入常安步以當車，有時博士與夫人左右隨行，司徒夫人體質素弱，亦不僱媪僕，博士為校務曾于一年內往返四渡太平洋，而一切家政及酬應，夫人均措置裕如，吾一次因事訪問二位夫人，見夫人正事女工，太夫人正與女生操杭州語談心，其慈祥和藹之風度，至今尚縈繞於腦府，素重禮教之華人家庭，確亦有不能及者，博士生長于美滿之家庭，故處人應事，均能適合華人心理。

今日之巍皇壯麗之校舍，十五年前乃陳樹藩未修理之別墅——一片荒邱野岡，枯樹蔓草，滿目淒涼，然彼尚無意讓權以建校舍也！幾經江朝宗等之斡旋商洽，始而讓一部，繼而留一半，至終方得全部之歸予，此均司徒博士之感化能力，致使硬性軍人為此一善。

校址既備，而鉅大之建築費，在華人手中，頗難募集；博士不得不返美以籌措之，時值華府會議之時，博士擬藉此機，晉謁吾國當局，聽取訓令，以期至美可以傳達中華意趣，而敦中美之邦誼，此為博士之善意，亦當受政府之歡迎，乃博士晉謁某前大總統時，竟因公忙未得親見。……博士抵美後，為中國，為燕京，日日演講，每日竟至八次之多，而訪晤諸大善士時，亦竟有去五次而不得一談者，博士從未以為勞而氣餒也！時時工作，處處辛勞，募集成數，匯寄來華，今日校中一草一木，一磚一石，物無巨細，莫不有博士之精神！此外博士在美又聯結友校，延聘教授，並從事于其他合作事業，博士每次返美，必有相當收穫，而中美之情誼，又因博士之貫通，促進匪淺！

博士於公餘，即孜孜讀書，無暇顧及其他娛樂，其演講，則理論正大，娓娓動聽；其行文，則氣魄雄壯，勃勃生動，與人相交，恭和可親，對於學生不只希冀有「君子」之教育，尤注重高尚之人格，實用之學識，服務之精神，其心無時不在發展燕大，援救中華，故自太夫人與夫人謝世後，孑然一身，從未再娶，猶欣然毅然日日為燕大久遠計；美哉燕京，榮哉同學，吾願吾等常仰德星之燦爛！

今當博士六秩大慶，謹祝

甲子重新如岡如阜；

春秋不老大德大年！

大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保定

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

冰心

今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司徒雷登校務長六十大慶，這些敬他愛他的人們，抓得了這個機會，都開盈盈的忙著分頭推進各種慶祝的方

式與項目。我呢，是敬愛他的學生中之一。而所能做的，只是一「搖筆桿」的事情，「馬負千鈞蟻馱一粒」，亦各盡其力之所能至而已！



(宅 住 長 務 校 即) 圖 軒 湖 臨

可是，仔細一問，關於司徒校務長一切的一切，都已有師長同

人們寫下了，寫得是那麼嚴肅，那麼詳細，那麼俏皮。我呢，從做學生起才認識他，講台下仰首，可望而不可即，不知道他的家庭，他的童年，更不知道他的戀愛故事。後來雖然勉強算得和他做了三年的同事，而我是個不重要的人兒，沒有機會同他商量過「大計」，也設有機會同他騎過馬，遊過山。我看見他的時候，只是開居宴會的時候，可是只是這談笑社交時所表現的一點點，已足使我傾服了。

這十幾年中，曾有過幾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過幾次短短的談話，每次的談話裏，都使我覺得他是兼有了嚴父的沉靜，和慈母的溫存。他款款的笑着，在你的對面或旁邊，兩手又握着放在膝上，用溫和懇摯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開口，他是不多說話的，他總儘量的給你機會，讓你傾吐你的來意，然後他用低柔的聲音，誠摯的話語，來給你指導與慰安。

人生中總有幾件最深刻的往事，是你所永遠忘不掉的，和這往事有關的人物，也總使你感激，思念，忘不掉。在燕大團體中，人人都縈縈愛念著，我們的司徒校務長，也正因為他與團體人人生命中幾件最深刻的往事，有著最密切的關連。

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孩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這使我拜服，驚異，他那得有這些精力與工夫？

想到燕大內外每天所處理的那些麻煩事；開會，開會，開會，行政的會，應酬的會，還有募捐，演講，謁見，訪問，談話，疏通，旅行，一會兒趕到美國去，一會兒又轉回中國來。這些應接不

暇的事都使人旋轉，煩亂，頭痛，而在此高處待理，雜務如毛之中，他還能極週到的想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同時他還捧出他的一切所有，房子，汽車，馬，衣服，金錢，時間……來方便這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事實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不必列舉——這使我拜服驚異，他那得這些精力與工夫？

一個人物的偉大，不但是能在「大處着眼」，尤其是能在「小處下手」。從纖細微小的事情裏，能表現出偉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偉大。

仔細分析這偉大的成分，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宗教的信仰，加個人的理想已與燕大的前途合一了，燕大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他與燕大團體的關係，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領袖與群衆的關係，是頭腦與肢體的關係，禍福與共，痛癢相關。他多付予了一分的愛與同情，就是與燕大的前途以多一分的發展與希望。就是他的博大的愛與同情，將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緊緊的拉在一起，一同歡樂奮發的往同工合作的路上走！

他從那裏得來的這偉大的愛與同情的力量，那就得問司徒校務長自己。曾有人說過校務長不大談起個人的宗教問題，我是從來沒有聽他說過的。

但宗教問題是「談談而已」的問題麼？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六，十二，一九三六。

司徒雷登校務長六秩大慶壽頌

曹 義敬祝

司徒尊師 原籍美國 先祖赫赫 名將顯職 公之父母 傳道是力
同葬華土 懿範典式 生長浙杭 遍歷四極 從事教育 積樹南北

大智若愚 居恒默默 偉謨碩劃 雄才大略 燕大胚胎 校舍纘耑
教員十數 學生七十 滲淡經營 不遺餘力 幾渡重洋 艱難永克
三百餘萬 校址營繕 經臨費用 胥賴募集 中西教授 專才備得
理事勤勞 遇人以德 義也不才 渥蒙采飾 十有數載 追隨昕夕
其才其學 難形翰墨 其識其德 後學典則 回憶五卅 慘案動國
主持正義 辭嚴義絕 領銜通電 推公第一 影響所及 國際變色
公之忠勇 萬世景式 公之態度 嚴肅謹飭 慶逢六秩 萬壽遙祝
敬獻頌章 永示銘勒

祝司徒先生六十大壽

張 銓

通常慶壽的文章，不外乎歌功頌德，冠冕堂皇的一類文章，作者既不善歌，又不能文，所以祇依個人對於先生的幾點感想，述說一點，聊表慶祝的意思。

(一)先生是一位「力行」的宗教家，社會上都承認先生是教育家，或者忽略了先生是一位忠實的基督徒，宗教家罷；先生為著名的老司徒牧師之長公子，自學業完成後，即回到中國，從事佈道事業。在當時對於基督教的福音，是不受人歡迎的。先生青年時期之宗教信仰，犧牲熱忱，與大無畏精神，不懼一切的艱難與危險，深入閉塞的內地——浙江餘杭鄉間。——去傳福音。結果是被鄉間反對的人，種種凌辱，甚至用石頭來攻擊先生。然而先生心內所抱負的是「真理」，「犧牲」，與「服務」，一切的打擊，忍受而已。現在先生之創造燕大，若沒有宗教家的信仰與毅力，恐先生當時被聘為燕大校長時，亦不敢輕於嘗試罷！

(二)先生是一位有「毅力」的教育家，身任大學校長，責任重大，已不可言。設或基金穩固，經費充裕，祇要標榜辦學方針，努力建設上去，社會上就算賢勞俱備的教育領袖了。然而燕大初設

時的環境，僻處在蓋甲廠的數幢小屋之中。論校舍則遠不如匯文中學，圖書則斗室二間。實驗室則一樓一底二間，理化均在其中了。如此設備，就是掛 Peking University 大招牌時的燕大，內容且分文理，神，農，商業，製革，新聞，六科。我們當時做學生的，那裏夢想到現在堂皇燦爛的燕大？事實告訴我們，現在的燕大內容如何充實呢？行政機關，何等莊嚴；課室，試驗室，圖書館，水電廠，運動場，大門，男女生宿舍，教職員住宅，等等設備，可謂盡善盡美。課程之博而精，教授之名著中外，學生之得種種學術上之名譽。現在之燕大，非特於全國學府中首屈一指，即於國際學府中，亦增一新生力軍。飲水思源，回想先生在蓋甲廠任校長時，每年秋季赴美，暑假前返校，年年如是，僕僕舟車，席不暇暖，在這十多年的燕大歷史中，已創造到現在的園地。我們問問先生用怎樣的法術，變出來這樣一大套，先生僅用微微一笑作回答。想來在這一笑之中，包含着無數的創造心血，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先生偉大的模範，已一樣樣地陳列在我們眼前。然而我們作如何觀感呢？作者僅以十二分的熱忱，敬祝先生六十壽辰萬歲！燕大萬歲！

司徒雷登六十大壽紀念

司鐸警世如雷。貫耳於今不下六六載。矣哉欲言吾師功勳

翰軀實難紀述

德業更足念茲

徒侶盈門宛登樂園此後何止十年壽也者豈論其人遐邇

門生呂振中拜祝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

以壽燕大者爲司徒先生壽

无住

司徒先生六十生辰，燕大師友開會祝壽。无住以病臥在床，不能躬與其盛。因爲短文，以應紀念刊編者之約。心之微妙，口不能傳，何有於文字？聊以示祝禱之意耳。

推原師友祝壽之意，豈盡出於私人情好？良以司徒先生平生事業，關係中國興亡。吾人觀感最切，遂欲借此一日，致謝意於既往，寄希望於將來也。

司徒先生宗奉基督，無國界，無階級，一以濟困扶危爲心。博大精神之所寄，厥爲燕京大學。故吾人今日爲司徒先生壽，當謀所以壽燕大者。

邇來華北政局日非，司教育之責者，每有朝不保夕之憂。吾聞亡人國者，必先亡其教育。蓋一國之教育存，雖在異族蹂躪之下，一線生機猶在，終有復興之望。盱衡華北諸校，有肯艱苦奮鬥，不至最後一刻，不爲遷徙偏安之圖者，吾燕大當是其一。燕大存在一日，華北一日不亡。故吾人能有以壽燕大，不僅爲司徒先生壽，亦即所以壽華北，壽中國也。

我國教育權迄未統一，各學校之性質，不免龐雜。過去有寧願關閉學校，絕不許其學生參加激發民族意識之救國運動者。時至今日，恐亦將興覆巢之歎。惟我燕大師友，自五卅以來，無時不爲學界救國運動之前驅，而司徒先生實愛護扶持之。即此一種精神，乃吾燕大之特長，亦中國國運之所托。吾人確信燕大之存在，將爲保障華北一最後堅壁者，實以此故。

雖然，吾人之所堅持，即敵人之所必爭。當敵騎縱橫之時，謀一文化機關之獨存，斯豈易言？既無堅甲利兵，可資防禦，而所謂國際關係，已顯見其不足恃。唯一可恃者，即吾今日與會師友堅苦

卓絕之精神。吾人所以壽無大，壽華北，壽司徒先生者，要不能外此。須知此後課堂及校園內之拚爭，其意義不減當年西北健兒之血染長城也。

今日談國事者，莫不痛心於兄弟鬩牆，而外侮莫禦。敵兵已深入腹地，守土者方醉心於自相殘殺，而未有定期。甚且不惜屈膝強敵，借寇援以求勝於同類。吾燕大師友，過去因經歷不同，主張或未能齊一，有時且不免責善之言。但信所爭者非一二人之私利，要在求得一真是真非，以為服務社會國家之去取標準。方當危難之際，並此是非之爭，亦應以當前大局之利害為斷。祛除疑忌，精誠團結，乃今日與會師友所常時自警惕者也。

以司徒先生今日體魄之康健，為燕大為中國盡力之日正長。至若司徒先生存亡生死之精神，必將於吾中華民族愛正義，愛自由之心性中，永存不朽。正如華北永為中國之領土，而其人民永為獨立自由之國民。帶礪河山，此情不渝。謹掬一腔熱血，以祝

中華民國萬歲！

燕京大學萬歲！

司徒先生萬歲！

從慶祝司徒先生六秩壽辰聯想到我們的

責任

張天澤

慶祝司徒先生的壽辰有雙層的意義：一來是表示我們的感謝，二來是表示我們的景仰。所以要感謝的是因為我們都在燕大念過（或是正在念）書。我們所景仰的一方面是司徒先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司徒先生的事業。所以慶祝這兩個字的意義，在這裏可以用句舊話去代表，是歌功頌德。因為歌功就是對於事業的成就的謳歌，頌德是感謝一個人的德澤，也是對於他的人格之景仰。

我自己，同諸位一樣，是受過司徒先生的德澤的，是景仰先生的人格和事業的，所以也來和諸位一同歌頌他的功德。



公共樓圖

但是我在歌功的時候，就想到司徒先生的事業的前途，頌德的

時候，更不免想起我們自己的責任。

一個人的功業的成就，是出發於他的宇宙觀，和他對於環境的認識。宇宙觀和一個人的先天的遺傳的體質和性情很有關係，認識則常是研究和觀察的結果。這兩件東西（尤其是宇宙觀）是比較固定的，是想做事業（不是職業）的人，選擇事業的時候的決定因素。至於處理事體的方法，只算是完成事業的必要手續，雖然可以依着幾個簡單的原則，却也可以因時因地而有改變。

司徒先生肯用他畢生的精力，去獻給我們祖國的文化事業，建設事業，可見得他的宇宙觀的偉大。他能夠成就現在萬目共睹的事業，又證明他對環境認識的深刻。

一個人成就事業的最大途徑，是把他的精力去貢獻給別人，而這樣的一個事業心，和這種事業經驗，也最能陶冶他自己的人格。司徒先生的人格，一定也在他的慘淡經營，豐富的事業經驗中，日臻完善。

我們對一個人的人格的認識，一方面由我們和他接觸的時候，主觀地覺察到的，另一方面是從他待人接物的方法上客觀地觀察得的。

司徒先生的人格是怎樣，有甚麼成分，我並不想在這兒分析，因為我假定讀我這篇文字的人，都和司徒先生接觸過，或是見過他待人接物的，所以他們腦子裏，都已經有了司徒先生的人格的印象。他們不要由這印象去分析司徒先生的人格，或是他們以為人格應當是怎樣的，不應當分析，那只是隨他們的意思。至於這人格的價值，也只好由他們自己去評判，去估定。我所要說的是：若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人格，我們自己是真正感到這人格的力量，並且是受了它的甄陶的，就該當把它發揮光大，叫它能有更大的影響，更大的甄陶力量。若是我們分析的結果，認為這人格的某

部份是有價值的，（我說「某部份」是因為一個人無論如何完善總還有他的缺點）也就該當把這些部份發揮光大。這是我們對司徒先生的第一個責任。

司徒先生的事業——最重要的部份，自然是他手創的母校——的偉大，我在上邊說過，是萬目共睹的了。然而要維持這事業的光榮，要叫這事業繼續發展，在目前中國險惡的環境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自然我們不應當過分悲觀，更不應當灰心，然而也不能不認識我們所處的環境，而重新下最大努力的決心。司徒先生已經用他生命的精華，去造成目前的事業，今後我們在他指導之下，去維持去發展他的事業，正是慶祝他的壽辰的最重要最長久的意義。所以我很希望這個慶祝，非但是讀完司徒先生事業史的光榮的一頁的謳歌和感激而已，也是一個艱難奮鬥的，光明前途的開始日子。希望燕京大學，能在不斷計劃，不斷奮鬥的動盪情形之下，同祖國穩渡了國難的時期，將來能在復興的，改造的祖國裏，佔一個光榮的位置。這是我們對司徒先生的第二個責任。

我們果然有這樣的決心，想司徒先生在接受我們慶祝的敬意的時候，也要感到格外的愉快。

司徒雷登先生六十壽頌序

羅學濂

司徒雷登先生美人也其家以傳道僑於華生於浙江羣者學濂負笈北平始得侍 先生左右 先生言論豐采浩賦邁群而仰其容貌則溫狀以和蓋 先生長於中國於我先賢之言行涵濡已深矣既而返美學成創辦燕京大學於北平積十數年之慘淡經營始克有今日之規模願 先生乃澹然不以自伐且思得當以還我國人有造於吾國之文化者不萎偉乎 先生之為人既內秉西方之美德而道誼又契乎華夏舉望相孚為我國與美邦人士所信賴即兩國間之外交亦每得其一言藉決策焉以居華久

故於我國之社會事物情態無不悉遂深同情於革命思想革命軍興同學之參與革命運動而遭捕縛者 先生輒翼護之多因是獲免於難學濂在學三年見 先生於同學之請益者獎掖之無不至所欲言無不盡即有所需求亦無不鑿所望而去嚮嚮煦育者春風之被於物以故同學咸樂從而敬愛之無復有民族彼我之介而 先生亦輒自視為中國人久矣昔在明季若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輩之於中國開近世學術思想之先河今 先生之所成就尤有功焉豈非我國家之所重賴者哉今年六月為 先生六十攬揆之辰同學諸君謀以為壽學濂獨謹撮述其平生之崖略與所裨助我國人者作為頌詞以示仰止云爾

矯矯司徒維美之彥篤生中國邁跡前賢令開洋溢志猷彌堅風徽所樹多士興焉翼我育我師表嚴嚴功多壽世福祐自天澤深流遠如嶽如淵康強逢吉晉祝永年

水調歌頭

胡慶育

司徒校務長六大慶，度此遙祝。

夫子何為者，辛勤六十年。未嘗坐席一暖，袍馬總關山。要使四方賢達，相助種桃種李，春色徧人間。顧此以為樂，亦足駐朱顏。學不厭，誨不倦，豈徒然。同房或隔千里，飲水肯忘源？客歲初周花甲，且喜精神長健，競獻白雲篇。德莫能名也，開筆欲無言。

回憶母校

薛澄清

說來好笑，我雖然尚未出國門半步，不能算是「留學生」，但以過去在高中以及大學求學的時代，一地跑過一地，在國內溜過了不少地方，至少總可以有資格當上「溜學生」的頭銜呢。今年六月廿四日是母校校務長司徒雷登博士周甲的壽慶，我很願意寫出些文

字來慶祝，但事情忙得很，僅能就腦中對母校一切所留下的印像，回憶一下，提起筆拉什寫出這篇文字，不三不四，閱者諒之。

南自閩，北至冀，我讀過了不少學校。最後到過燕大，把這些學校比較一下，別的且不說，只就校舍與設備論，燕大的實在可算最好。因之，在燕大求學的男女生，他們——尤其是她們的學校生活，真夠舒服。有人說過，大學生不該過這樣好的日常生活，（所謂燕大貴族化的生活），這當然也有他的道理，不過那是僅就中國現下實況來比較，恐怕畢業生出校，和社會實際生活格格不入，未能習慣，若就理論言，並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們現在且撥開這問題，單問燕大今日有這樣規模宏大的校舍，是誰勞過心血弄得來的呢？可不是我們這一位現在年已周甲的校務長司徒雷登博士嗎？這是我到過燕大，留下的印像之一。

其次，母校中諸位教職員的分工合作，表現出「努力」的精神，也正是司徒先生善於領袖各部人員所感動的吧！我個人在校，並未參加過學生會的幹部工作，和司徒先生接觸的機會固然很少，但當時我在校中，適為「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學生方面開了不少次的大會，熱烈討論救國方法，到會的不僅學生，還有司徒先生也好幾次親自上台訓話，他那種沉毅的精神，不忙的態度，表示他的辦事能幹。我常想：壯年人的血氣受過社會的鍛鍊，外表好似比較青年人來得遲緩緩進，但鍛鍊過的鐵，可就是鋼啊！其功用正不在外表，而實是內在的充實啊！老實說，我為了國事，也曾流了淚，貼過標語，喊過口號，可是近年來讀過好些愛國偉人的傳記，我越覺得內在的充實的重要。四年前，我在校除參加各種救國的團體外，還曾聯絡過平市同鄉，組織所謂「福建旅外救國八人團」，刊行「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之積極政策」一書分贈親友，而今國難更為危急，論理我該比較學生時代的主張更加來得急進，可是去年冬

，學生救國復興，我眼看著這一批男女學生執着旗子在街上吶喊，軍警步步監視，我不禁回憶當初，有感於中，然而到底這感情仍為理智所克復，平靜下去，回頭想一想司徒校務長的沉毅的精神，我又在這內在充實的方面下苦工夫了。我雖未至壯年，而今略略曉得「沉毅」的工夫，除起受吾友葉君國慶的勉勵以外，可以說完全是領受了司徒校務長的教訓得來的，這是值得我回憶的印象之二。

一個大學最必須具備的條件，我以為是「學術研究」的空氣。大學不僅是上課，何況燕大又加上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呢？以我短短一年的時間在母校，自然不敢說我進入燕大，于本門學問已登堂入室了，可是事實是這樣，燕大大部分的教授是好學的，是富有研究學術的精神的！看啊！那一系的教授沒有現在國內外人士所敬仰的學者在其中以身作則，領導學生努力向學呢？別的且不說，單就歷史系而言，洪業，顧頡剛，鄧之誠，張星烺，王克私諸先生實在予學生以很深刻的印象。清也不幸，畢業母校，即奔父喪，南返工作，離開「文化中心」的北平，已足痛惜了，且加上了失去這些良師的指導，怎麼好呢！每念及此，不禁神往。然而又想到母校校訓中有「服務」這二個字，我明白了，我應該學學司徒先生為燕大服務的犧牲，我也應來為本鄉的教育稍盡義務。我慚愧我還沒有專門的學問，所以「服務」以外，還記得時時「求真理」，這種「服務」和「求真理」的精神我自信是得自燕大的，這是值得我回憶的印象之三。

話還有很多，因為事忙，恨未能多寫，且也恐怕多費友聲寶貴的篇幅，所以本文就此結束。未了，願此，敬祝司徒校務長暨校中諸師友健康！并祝母校進步無疆，萬歲，萬萬歲！

☆ ☆ ☆ ☆ ☆

一本「活書」

楊肖彭

一九二九年的秋天，那時我剛剛離開南開不滿兩個月，就以南中校友的資格，在姊妹樓裏參加歡迎我們那位校長——張伯苓先生——的大會，我記得清清楚楚，張先生對我們這樣說：「……你們大家離開南開到燕京來，不是為了宮殿式的樓房，乃是要在學識上得點深造。不過大家要注意，書本裏邊的學問，祇能作一種參考，圖書館裏面的書籍是要活人去讀的，望大家讀活書，不要作了書奴。然而圖書館裏雖然有些死書，可是這裏却有一本活書，就是司徒雷登先生，大家在燕京念書，無論看多少本圖書館裏的印本，惟有這一本活書，是人人須讀，而且是時時須讀的」。

敘述司徒先生的事業，那是將來研究中國教育史的人的工作。「頌揚德政」式的詩辭歌賦，那是文人的特能。我在燕京雖有四年之久，就中最後一年，還趕上司徒先生回國，然而我個人和他談話的機會總計不滿三次。但是我每逢見到司徒先生和悅的面目的時候，心靈裏邊，便會產生一種無上的快感。這一種對人的自然感動力，不能不說是他靈性上修養的結果。我從來不曾聽見有人講到司徒先生的煩悶情形，與他為一件什麼事體發怒。

大概一個偉人都有幾分剛性，這種剛性便是他成就事業的動力。反過來說，沒有這種剛性是不能成功大事業的。但是一個人過于剛性化而失之於柔，他的事業的成功，恐怕要成曇花一現的燦爛，却不能持久。所以我們在司徒先生的事業上，我們可以毫無疑意的證實了他確有一種剛性的毅力。然而在他的處世待人方面，又是一位極忠實極誠懇和藹可親的朋友。在基督教的立場上來講，他是一個篤誠的信徒，在燕大的立場上來講，他是一位青年的良師，在社會的立場上，他是一位模範的領袖，在國際的立場上，他是中

國的親摯的朋友。

我們在書本上所讀到的偉人，固然可以間接的影響了我們的人格，然而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隔離，往往會減低了我們的信心。青年立身處世，至少應該先有一個最低的標準，當我們踏着人生之路的時候，在我們面前又不能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但是這目標越是定得高遠，越覺得生活渺茫。一艘孤輪在遠到不能望見燈塔的時候，惟有倚靠船上的指南針，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我們眼前既然有一個現成的生活標準，爲甚麼不把他抓住？這種近水樓臺的標準人物，我們不效法，又何必整天的默想那些古聖先賢？我們既然有這一本「活書」可讀，又何必去在死書上耗費時光？我們大可節省一點時間，在知識上多下工夫，因爲有這一本「活書」，可以作我們「做人的手冊」了。

今逢司徒先生六旬大慶的佳期，又承本刊編者之囑，就此恭祝司徒先生的健康，和諸位在校與出校校友們的努力！我們一齊來翻印這本沒有版權的「活書」，同時在這一方面也有我們自己的創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於天津

永久忘不了的一件事

張鐵笙

——對於校務長的一個永久記憶——

這是我永久忘不了的一件事，永久忘不了的一件事，想起來便不由得深深受着感動。

那是一九三三的新正，檢閱告急，母校同學爲了受愛國心的驅使，全體議決罷課停考，參加愛國運動。議案交到抗日會來執行，我們十一個人（吳世昌——主席——蕭文安，葉楚生，劉紀華，譚誨英，劉占元，葉德光，周振光，史國雅，盧惠慶）澈夜討論，始終

想不出一個兩全之策，使大家不停考還能參加愛國運動，終于便執行了這個議案，宣布停了考試。

那時校務長正在上海，校務由別人代理。他們聽見了學生自動停考，頗有點不能諒解，並且有人把這件事的責任推到十一個抗日會委員的身上，主張開除我們，但我們十一個人，平心而論，素日在學校不能算壞學生，所以校務委員會的諸位師長，對於開除我們的事，也沒有下最後決定，便打電報給在滬的校務長，請他速回主持一切。我們十一個人也一方面作着自己分內的事務，一方面等待這最後的裁判。終于，校務長回來了，就在他到校的一個鐘頭裏，我們每個人都收到一份請柬，邀我們到臨湖軒吃茶。

我們按着規定的時間走去，每個人的心是搖搖不安的。想不到臨湖軒，他笑眯眯地和我们握手，仁藹的容貌上，顯着一團慈母對於兒女的愛意。他親切地問着我們停課停考的理由，和辦理愛國運動的一切經過，也把教職員對於我們停課停考的看法，詳細地解說給我們聽。最後，他誠懇地說：『讓我們大家想想怎麼辦對於中國有好處罷。只要工作想得出來，對於中國有益，我去請教職員和你們一道來做！』果然一場風波平息了，師生團聚着做起事來——萬頂鋼盔運動，便是那樣發起，也便是那樣完成了。當我把萬頂鋼盔運動成功的一個消息，騎了車子送到平津幾個大報發表的時候，回想起來當日的情形，心裏感動得要流下淚來。

現在，時局越來越緊迫了，各大中學也常常發生類似當年我們在抗時的事，也有不少同學爲了心頭的一股熱血，遭了退學或革除的處分，毀滅了他們的前途，回想起校務長對待我們的方法來，真令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這是我永久忘不了的一件事！

☆

☆

☆

☆

公·正·誠·和

蔣蔭恩

在燕京讀了四年書，做了半年事，覺得全校裏的人，能使我信仰崇拜的，祇有司徒先生一個人。等到了校門，走入社會，環顧四周的人，不是烏烟瘴氣，就是鬼蜮陰險，越發使我感到司徒先生的可敬可愛。我想，凡是燕京畢業的校友，對我這個意思，一定會同感。

司徒先生一生的為人，可以用「公」，「正」，「誠」，「和」四個字來代表。無論學校裡什麼事情，他都是用一種「公平」「正直」的態度來處理。記得一九三二年冬天，正是熱河戰事緊急的時候，全校師生，都從事愛國工作，因此學生會方面，向學校當局要求延期大考，以免影響愛國工作的進行。此時司徒先生適在上海，因之要求竟遭拒絕。於是學生會遂決定自動停考，以示抵制。雙方互相堅持，各趨極端，似有決裂之勢。司徒先生在滬得知，乃兼程趕回，對大家說：「愛國的事，我們外籍教職員，不但表示同情，而且還應該出力相助。大家既要求延期考試，就等到下季開學後再考，還不是一樣」。這幾句簡單而又誠懇的話，真使大家心悅誠服，鼓起加倍的精神，一心一意地幹着愛國工作。

司徒先生雖然是一手創造燕大的人，可是絲毫沒有自高自大的神情。不論一舉一動，或是待人接物，真是和氣到萬分。姑不說教職員同學，就是校內的工友，司徒先生對於他們，也從沒有高聲責罵過一次，平時總是和顏悅色，非常客氣。所以全校的工友，對於司徒先生，也都是十分崇拜，十分愛戴。司徒先生不喜歡坐洋車，平時出入，都是步行，一路上和他遇見的人，不論是教職員，同學，工友，車夫，或是校門外的店伙們，都得向他打招呼。司徒先生也笑容可掬，一一加以回答，一種親愛的神情，雖家人父子，亦

不過如此。

我現在因為職務的關係，天天和外國人在打交道。有些有知識，明理的外國人，都能客氣對人。最壞的是那些滿身銅臭的外國大商人，神氣十足，架子尤大。當我被請在會客室裏，等到半點鐘還沒有看見人來時，心中一無聊，就會想起那和藹可親的司徒先生。當我坐在沙發上眼望着地毯出神時，常常發生一種癡想，想的是：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司徒先生那樣公正誠和，恐怕一切的糾紛，皆不會發生。整個的世界，會變得和燕京校園一樣的和平，美麗。

這次司徒先生由美國回來，航到上海的那天，我本想拿了新聞記者證到吳淞口去接他。可是因為臨時有事，沒趕上海關接客的小輪，只得在碼頭上等候。但是，第一隻接客小輪來了，沒看見司徒先生的影子，第二隻來了，又是沒有，後來想起司徒先生每次在上海總是住國際飯店的多，連忙打電話去問國際飯店，才知道司徒先生坐了特備的船早已到了該店休息。於是在碼頭上等候的一部分男女校友，又趕到國際飯店。一進大門，就看見司徒先生笑嘻嘻的站在那裏等着我們。大家走到茶點室，一面吃茶點，一面聽司徒先生報告在美情形，那時每人心裏，都蘊蓄着一種說不出的欣喜。好像家庭裏久別了的尊長，一旦重逢，真有依依不捨之概。

燕京的精神，向來是受着外界的讚美。現在，愈是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愈可顯出燕京精神的卓越。然而，這個偌大的團體，是缺不了牠的偉大的領袖。我們的司徒先生今年雖已屆花甲大慶，然而他的精神體力，却一點沒有顯着老態。燕京的前途，還要靠他來發展，光大。我雖身在千里以外，不能趕回學校，稱觴祝壽，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回燕京，什麼歡宴，游藝會的偉大，熱鬧，我都可以閉上眼睛想像得出。現在，謹藉友聲一席地，敬祝

司徒先生四時如意，八節安康。

六月一日於上海大公報

詩情瀾漫的燕京大學

(一九三五)陳先澤

上

記得有一位環遊世界的旅行家，曾稱讚燕京大學為世界上具有最美校景各大學之一。可不是嗎？燕大學生終日就像在圖畫中過活！燕大校景的美，不在於瑰瑋華麗或物質設備的完善，而在於山水林園的幽靜與富於詩的情趣。一個遊客到燕大觀光，當投身於湖光塔影中時，他會感覺到澈骨的恬靜。這邊是一湖止水，倒映着垂柳和停雲的影子，那邊是紅樓一角，從萬綠叢中隱約露出來，假使湊巧的話，還可聽見小山上傳來數聲古鐘，衝破這瀟寂的空氣——不，它更添了周遭的靜。

一個學生生活在燕大，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環境都是美的。處於那種環境中，自然而然地培養出一種蓬勃的「朝氣」，令他無論如何是快樂的，由快樂得到力量——這力量就添加他工作的效率，和向上奮鬥的勇氣。如果中國該效法德國，提倡「由快樂得力量」的運動，燕大便是這種運動的推進者。這種優點由他們多方面的生活上表現出來。假使你在我們工作的時間內，到圖書館，實驗室，課室等處去作個巡禮，那種緊張的空氣，的確會令你意識到血液在加速流動。可是燕大的真價值，倒不全在於這一時，可以從外表見得出的東西，而在於他們全個大學生活的整體。自由研究精神的發達，導師制度(Tutor System)效能的發揮，男女社交的正常化，工作與娛樂的合理調劑……在在表現出燕大已相當成功一個「大學」。「University」這個字的本身，就表示在裏頭作業的人，不單要讀書，而且得經過一種「生活」的訓練。這也就是大學和專科學校的主要

差異處。然而這一方面的好處，不但外人很不容易覺察得出，有時還引起許多庸俗不合理的誤解。

中

燕大裏頭的空氣，多少帶點「國際」味兒。教授和學生，除大多數是國人外，有着英，法，美，德，日，瑞各種不同的國籍。有一部分學生還是夏威夷，爪哇等處回國的華僑。一個外邊人進燕大去，他會覺得奇怪；這邊聽見英語或法語，那邊偶然又會聽到很難懂的馬來話。服裝方面，也有特異的地方。外籍教職員和學生，好些愛穿中國衣服的。西洋女孩子穿起藍布大褂時的姿態挺有趣的，的確是「燕京一景」！諸如此類的事多着呢，譬如說到女宿舍那一帶去溜達溜達，當鋼琴上蕭賓的樂音，從紫藤花叢鑽出來時，說不定那十足中國型的古鐘聲，會從另一方面同時傳進你的耳鼓。到男生宿舍那邊去，這種情形更容易見到：一個角落的話匣子開着「Marsellaise」時，另一角落也許有人在拉胡琴大唱其「法門寺」。然而這一切是意外的和諧，絕不會使你發生不快之感。這倒是一種奇蹟：

拿一天中一般的生活來說，也是很有趣的，每天清晨遠遠傳來西苑一片軍號聲；早餐前名湖畔有人在散步，吸新鮮空氣，作柔軟體操；楓島上有人在執卷沉思。等到太陽從東方塔邊升上來以後，校內的空氣便漸漸緊張起來；吃早飯略，趕上早課，上圖書館讀參考書略，自行車往來如梭，直至鐘聲正式宣告上課為止。下午呢，課室的工作比較少，大概唸文法科的上圖，唸理化醫的上實驗室。在學生作業的時間內，一切在嚴肅靜默中進行着。到了午後四五點鐘的時候，情形就大大不同，彷彿換了一個世界。這時全校活動的中心移到運動場和體育館了。「力」和「動」的氣氛，會令一個體質羸弱的人感覺慚愧。「天鵝絨手套裏藏着鐵拳！」誰相信這

一羣富有「蠻力」的青年人，在某個時候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到了晚上，活動中心又移到大園（各學系還有自己的園）擁擠然而靜肅，你的脚步若是稍為響點，視線的掃射是比什麼都有效的制裁。

下

舊京的景物，四時各有其可愛處。春天來了；校內就充滿着鳥語花香，和暖的陽光，新萌的綠柳，處處物物策動着生的力量。教授先生高興的話，他會和學生們到外面陽光下的草地上上課。春天是最適合於野餐的季節，週末如果想玩時，男孩子可以斬柴挑水搬石頭，女孩子們可以燒飯炒菜煮咖啡，這樣就可西山上過忘形的一天。

我喜歡在燕大過夏天，因為那兒是個避暑的好處所。暑期留居校中，上午當然可拚命工作，留個下午去儘量閒散。午飯後在樓頭睡午覺挺寫意，樓前柳叢裏的鳴蟬，老會給你唱最入耳的催眠歌。醒過來時，躲在湖濱柳樹下讀書，談天，垂釣，——簡直不會感覺到「熱」，晚飯後結伴留連荷池畔，低聲唱着歌兒，讓微風給你送來荷花和荷葉的香氣。這些時光是容易過的，轉眼就會發見星斗滿天。

秋天又是一番滋味。這時輪到楓島上的紅葉當時了。紅的葉總



着蔚藍的天，形成校園內富有吸引力的風景線。秋的天空是分外清明的，站在島上向校友們那邊望去，西山在圍牆外窺探你，一種「悠然見南山」的情趣，悄悄爬上你的心。如果是雨後的話，那種爽朗的景緻，正像淚洗過的心境。每逢星期日，校內常有小組繩上山「掃楓」；他們的收穫，就是一片片火紅的書簽，如果有月亮的話，秋夜在燕京是千萬不該放過的良辰。晚上由圓唸完書出來，皓月當頭，樹影在地，一切的景物好像浸在靜水裏一樣的美，在校境內兜圈子，就無異逍遙夢境中。

如果燕大四季生活是一齣戲劇的話，冬季就是這齣戲劇的Overtone。雪和冰好像將興奮帶來人間。當白雪把整個校境化成童話世界的時候，做雪人略，玩雪球略，雪戰略！這一羣青年男女，簡直就像十零歲的小孩。好攝影的，這時帶着加末拉滿處跑。冬季一到，沒有人不渴望湖水快快結冰，因為這是全國第一的天然冰場。冰場完成後，未名湖就是師生課餘運動娛樂的中心。每天下午四點鐘後，你如果從遠處望去，那種景象，彷彿一羣羣燕子在掠過水面飛舞。如果週末的晚上溪巧有月亮，湖上就加倍熱鬧。看自己的影子在隨着自己旋轉，特別寫意！

各地校友會獻辭

祝司徒雷登博士六秩壽序並獻辭

燕大同學會廣州分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有四日，爲司徒雷登博士六十初度之辰，全國燕京校友念其勤勞，感其德化，恭行慶典，用申景慕。嘗聞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智者樂，仁者壽。蓋不惑則識見遠，大業成，樂在其中矣。不憂則魄力充，心神泰，壽在其中矣。司徒博士博學多聞，寬仁厚澤。其處事也，不苟安，不辭勞；其接物也，莊而溫，恭而有禮；可謂仁智兼備，心安理得，宜乎其樂且壽也。

司徒雷登校長六秩壽序紀念

仁壽同登

燕京大學同學會廣州分會敬賀

爲國中最高之學府；聲譽之隆，人才之盛，交孚中外。造福中華，加惠於士林者，微司徒其孰與功。吾人飲水思源，欽仰之餘，謹作誦以祝：

司徒博士，籍屬北美，誕

穆穆司徒，聿來中國，秉直司聰，孔懷令德，任怨任勞，匪愆匪忒。

輯柔爾顏，栖栖爾躬，不矜不伐，莫汝爭功。廿載辛勤，旬茲燕京，爰始爰謀，以營以成。渠渠夏屋，卉木繁榮，紛紛士女，負笈葵傾。

德音秩秩，育才之英，背國忘家，肝食宵征。誰其念之，鬢霜雙影；誰其勞之，依依南嶺，北望蹉跎，莫禁神騁。智者無憂，仁者多壽，豈弟君子，受大之祐。靈輿我公，六十初度，慶值良辰，願言懷慕。

獻此才屏，祝公永康；悠悠此心，山高水長。

天生燕大之父

燕京大學同學會廣州分會敬賀

好風時雨萬樹花爭舉
蜂蝶鬧流鶯語青山垂翠蔭
碧草繁新絮人壽起歡欣
共感春恩昔日重洋度喜結同情侶
儼素願平艱阻階前桃李笑
堂上文星舞飛彩鶴啣米海屋籌難數

右詞千秋歲用祝

司徒校務長六旬正慶

太谷燕大同學會敬祝

祝明倫學堂二十六年畢業生致辭

明倫學堂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熱心支持，不特學業日見發達，且其精神亦日見振奮。二十六年畢業生之出，實為本堂歷史上之重要一頁。...

勤學敏求 秉志中興 兼重道德 允惟公選
德器長成 砥礪意志 經忠履慎 細細研經
不務不效 真金鑄鍊 甘饒草動 胸懷萬家
兼補其缺 以管以試 孫孫夏履 升木登登
列外士女 夙夜匪懈 德音煥然 育才之英

去國忘家 行字有征 惟其愛之 髮齒多彰
惟其勇之 棟樑漸廣 壯望履驗 真應神賜
智勇無憂 仁者多壽 魚鱗君子 愛天之祐
憂憂我公 六十初度 慶值良辰 願宜懷慕
敬獻丹屏 祝公永履 景行猶旌 山高水長

廣大同學會廣州分會暨南寧分會

本會同人等，頃聞貴會畢業生，均能學業有成，且其精神亦日見振奮。二十六年畢業生之出，實為本堂歷史上之重要一頁。...

敬獻

雜 俎

司徒雷登先生六十壽誕感恩禮拜記

杭州周鼎臣

雷登先生為司徒爾老先生之長公子，生長在杭，洞悉華人之心理。先生天性仁愛，對於人情諸多體貼。歷任杭州區會傳道，南京金陵神學教員，北平燕京大學校務長，培植子弟，造就人才，間有解囊相助者，造福華人其功綦偉。其人之熱心事神，道德才華，莫不使人咸生敬仰之心。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一刻禮拜後，湖山堂（該堂為先生尊翁之紀念堂）全體信徒，並燕京大學杭州同學會，為先生做一慶壽感恩禮拜。由邱牧師主席，特請弘道女校唱詩班歌慶壽詩。邱牧師歷述先生在



(一) 影留拜禮恩感堂山湖

杭為教會服務之功績，又在京為金陵神學教員，訓教學生猶如慈父之愛幼子，學生如有探討，課餘亦許至其私宅，復詳加指導，熱心幫助，使人得益，凡受教者莫不有口皆碑。後以北平燕京大學需才孔急，鑑雷登先生為超然派人物，中西咸欽，校方莫不深欽其人，提出徵聘，全體翕然，雖痛惜金陵神學失一良師，但不得不為燕大慶焉。次由燕京同學會顧敦

任校務長之職，天賦才幹，超乎人羣，志在中國辦理一完全高等學府，間遇困難，斥言解決，因其態度言語莫不使人心悅誠服。推其致力原因，實秉具上帝豐盛之生命也。末由邱牧師為雷登先生專誠祈禱，全體獻捐為慶壽，以表微忱，祝福散會。

校務長在北平

顧敦錄述

校務長在北平主要之事業，厥為燕京大學之建設，（一）其始也發揮其偉大之團結力，赤手空拳，將北方公會不同，旨趣紛歧之各大學，聯合而成現在規模宏遠之

(二) 影留拜禮恩感堂山湖



錄先生演說略謂先生在燕京担

(三) 影留拜禮恩感堂山湖



最高學府(二)其教導生徒，尤能不壓迫，不放任，精誠感化，因勢利導，嘗憶某次風潮，校務長處理之法，非開除學生，非提前放假，亦非聽任學生為所欲為，而為一個教職員學生之全體大會，會中校務長只宜讀一篇訓辭，其警句云「余深信諸生有絕大之勢力此勢力，可以毀滅此學校，亦可以建設此學校，爾等其為建設之勢力乎」，語畢會散，而一場風波竟化為一團和氣矣。(三)至其創辦中國第一流之師學院，提倡國學之研究，培植中國自生的科學，養成基督化之政法領袖人材，以為新國家之建設，以及倡導百萬基金運動，以奠定燕大之基礎，皆能獨具隻眼，率先行之，收效之宏，若有神助。

〔校友簡訊〕

北平

張信德君 任北平王府井大街秀鶴圖書館經理職，寓東總布胡同十三號

林碧鏗女士 通訊處北平東城二十四間房甲三號

張永和君 北平西長安街和記印書館任務，寓宣外棉花上六條十六號

楊傑元君 通訊處北平東四牌樓六條石橋八號

劉偉通君 任職北平醫學校

南京

卓遠來君 現在南京外交部歐美司服務，通訊處南京珞珈路九號

河南

白壽昌君 鄭州河東街十七號豫鐘皮革廠

湖北

張少棠君 現在漢口法租界首善里二號德士古公司服務

浙江

王岫贍女士 現寓浙江麗水縣燧昌火柴公司內遂園逸廬

福建

林貴池君 廈門中山路和裕信託公司

安徽

韓宗明君 任安徽省立蚌埠工業學校製革專科教員

廣東

馬瑞斌君 現服務廣州德商禪臣洋行機器部，通信處廣州東山馬棚崗十七號二樓

林瑞銘君 廣州市立廣東女子師範教員，通訊處廣州廣仁路社仁坊新街十號

陳爾聰君 通訊處廣州河南鳳安街鳳安小學校

沈錫珉君 在廣州嶺南大學教職

楊暮馨君 全上

葉秀英女士 全上

陳德恩君 全上

陳寧馨君 全上

莫淦明君 廣州東泉大道西伯莫宅

阮雁鳴君 廣州杉木欄路信合號

區 儲女士 香港循環報記者，通訊處廣州廣仁路平陽

汕頭

鄭少懷君 現在五經富區會任宗教教育幹事之職

山海關

李德馨君 北寧鐵路醫院

國外

胡鐘慶君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

高學忠君 美國米西干大學研究

嚴 復君 405 Forest St. Ann Arbor, Michigan, U. S. A.

黃 霈君 1333 John Jay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 Y. U. S. A.

日本東京神田明治大學研究 通訊處東京杉並區高圓寺

一丁目四四八番地青葉莊

慶祝司徒校長六十大壽辰程序

六月二十三日

敬職員慶祝壽辰宴會

時間：晚八時

地點：女生體育館

六月二十四日

返校校友報到

時間：自上午八時至十時

地點：貝公樓接待室

各種展覽

時間：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一 中國現代文物圖書展覽

主辦者：哈佛燕京學社

地點：圖書館第二閱覽室

二 附屬學校成績展覽

主辦者：教育學系

地點：適樓

三 小報展覽

主辦者：新聞學系

地點：貝公樓上新聞學系

四 圖書字畫展覽

主辦者：國文學系

地點：貝公樓上國文學系

五 中西善本書籍

本校各系及個人出版物

校園金石拓存及

司徒校長個人照片展覽

主辦者：圖書館

地點：圖書館第一閱覽室

六 物理學系展覽

地點：睿樓樓下

七 生物學系研究成績展覽

地點：睿樓樓上

八 化學系研究成績展覽

地點：化學樓

九 家政見習室展覽

地點：南校門內家政見習室

十 燕大婦女工廠展覽

地點：東校門內路南

十一 國畫及西畫展覽

主辦者：陳哲，蔣世顯，張家駒

地點：適樓

十二 清河實驗區成績展覽

地點：禮樓

十三 狗展

地點：未名湖南岸

校友聚餐

時間：下午三時

時間：正午十二時

地點：男生體育館

男生體育表演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東校門內運動場

工友獻壽禮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臨湖軒

司徒校長招待茶會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臨湖軒

女生體育表演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女生運動場

游藝大會

時間：晚七時三十分

地點：貝公樓

◎附各地校友代表大會程序

六月二十五日

大會開幕

時間：上午十時

地點：臨湖軒

學校招待宴

時間：下午七時

留校校友招待宴

時間：下午七時

六月二十六日

校友會執委會招待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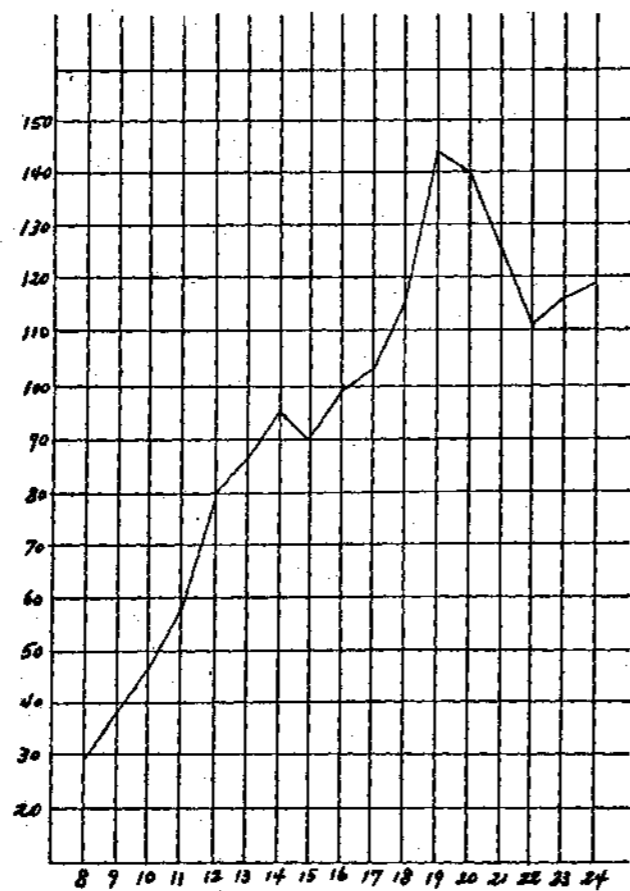
時間：正午十二時

地點：城內燈市口校友會

大會閉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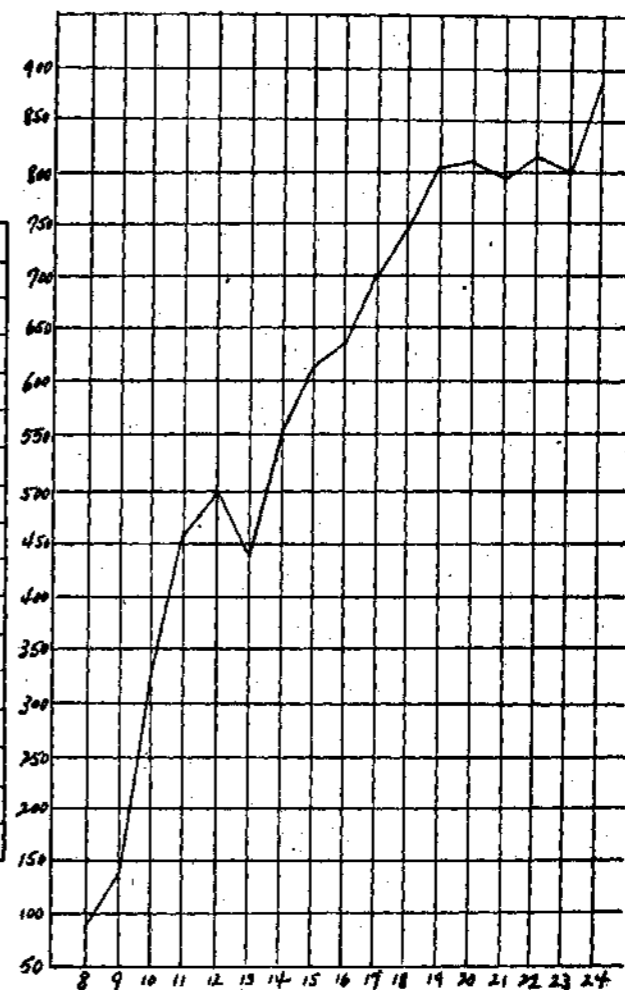
曆年教員總數比較圖

民國八年	29
民國九年	38
民國十年	46
民國十一年	57
民國十二年	80
民國十三年	86
民國十四年	95
民國十五年	90
民國十六年	99
民國十七年	103
民國十八年	114
民國十九年	143
民國二十年	140
民國廿一年	126
民國廿二年	111
民國廿三年	116
民國廿四年	118



曆年學生總數比較圖

	男	女	共
民國八年	87		87
民國九年	137		137
民國十年	221	106	327
民國十一年	366	92	460
民國十二年	400	100	500
民國十三年	325	113	438
民國十四年	433	119	552
民國十五年	512	104	616
民國十六年	509	124	633
民國十七年	550	150	700
民國十八年	558	189	747
民國十九年	579	229	808
民國二十年	578	233	811
民國廿一年	562	226	788
民國廿二年	560	255	815
民國廿三年	551	249	800
民國廿四年	611	274	885



美國駐華大使題詞

J. Leighton Stuar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brought a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new to the Orient. Born and bred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it was believed that everyone had a right to learn to read and to write and to cipher, an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a free opportunity to learn these things rested fundamentally with the State, he brought that belief with him when he came to the Orient to preach the Gospel of Christ.

He arrived to find that education in China was of a highly individualistic kind and that, whereas any individual who had the means and the desire and the persistence might, whatever his origin, obtain an education, the way was hard, and the State took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 paving the road or providing facilities for the student. He was shocked to find that the great mass of the people were illiterate and therefore unable to read the religious message tha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had to present. He was shocked to discover that no effort was apparently being made by the State to provide a free education for the mass of the people, - the "yü min" or "stupid people" as they were calle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set about to remedy that situation at once. He organized schools of his own where the people might learn to read his message and perhaps communicate it to others by writing. Two things then happened, and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both. First ther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American ideal of a free public school, maintained by the Stat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Second, there began the u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for the expression in writing of thought other than that involved in the telling of popular and romantic storie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school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Chinese State-maintained schools and colleges of to-day

where Chinese youth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can collect in large groups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a common end.

The use of the vulgar tongue by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as a medium for putting into Chinese the Bible, the sermon, and various English texts, in order that the simply taught students of the Protestant schools might read the message which the missionary brought, paved the way for the literary renaissance of today. Now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no longer bury their thoughts under the embroidery of simile and literary allusion borrowed from China's great wealth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y are putting their thoughts simply into the plain, unadorned, frank speech of the common people, for the common people to read.

Dr. Stuart, grands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at great pioneer American institution, Transylvania College, born in Hangchow where his father organized a school for boys, nobly represent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effort in China. True to his heritage, he soon found himself in educational work. He has been the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since 1918, and the institution as we now know it, beautifully housed on its sunny campus outside of the walls of Peiping, bears eloquent testimony to the idealism that inspired Dr. Stuart and those that went before him.

Dr. Stuart in his life and in his work belongs to a noble group of selfless men and women who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in the Orient. It must comfort him to see what effect that idealism has had and to know that those ideals of public education so established have been accepted and will remain as on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s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reat culture of the Orient.

Nelson Trusler Johnson

The Dr. Stuart I Know

L. C. Porter

Mountain climbing and long-distance swimming are the two favorite recreation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In a definite way, these recreations expres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n. Both of these recreations call for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to a large degree. On a mountain path there is always the next corner to turn or the peak beyond to climb to; and in long-distance swimming one always wants to go just a little further. President Stuart in all his work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 implied in these recreations. His is distinctly an adventurous spirit. Through the years he has repeatedly reminded us of the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before us as he has urged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go forward in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trying new experiments and always leaving behind that which has become too much ordered and put in routine forms. In a very real sense the whole university undertaking has been an adventure of faith,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energy that President Stuart has shown not only in looking forward, but in living forward has been a factor, an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University during its short life time.

Repeatedly through the years I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value to Yenching in having at the head a leader adventurous himself, and encouraging new ideas and adventure into new methods, on the part of his colleagues. He would be the first to admit that many of his adventurous suggestion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and that most of them needed, before they could be put into effect, the careful criticism of those members of the staff, gifted with the wisdom of caution, disinclined to new moves and persistent in demand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ward-looking plans and actual conditions.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Yenching could not have succeeded as it has if there had not been in the team of workers men with just the wise conservative and critical caution needed to balance the enthusiastic venturesomeness of the President. But it is quite clear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a team in which new experi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encour-

aged and venturing is typical of the leadership, and one in which the leadership is cautious and disinclined to make new moves. With a leader of that type new suggestions and venturesomeness among members of the staff is not encouraged, and there is a definite tendency towards slowing down the pace, and the rigidity that tends to creep over all human institutions.

Were it not for his life of adventure Leighton Stuart would have never come to Yenching. It was disharmony in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attempt to unite two universities each of which had its own long standing tradition that attracted him in the first place. His forward-looking spirit, his faith that a united Christian university for North China wa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were essential factors in realizing that possibility. Willingness to try the new and unexpected made possible the eventual selection of the present site outside the city walls. Experiments in various practical departments of work are a further expression of the P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try the new.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se years at point after point one can see what it has meant to have a leader always in advance of his time and encouraging initiative and new suggestions in his followers.

With this forward-reaching faith Leighton Stuart combines a gift for friendship, love and personal concern for his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fellow workers. He can convey to each individual in our community, from deans and professors to gate keepers and campus workmen, a sense of the particular importance of that individual's share in the task at which all work together; a sense too of his own special confidence in each one and of reliance upon each on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his own share of work.

Thus our President is the vital centre of the inspiration that has enabled Yenching to surmount obstacles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pass steadfastly through each one of the many crises that have marked these confusing years in Chinese history. Armed with such inspiration at once devoted, steadfast, experimental and forward-reaching Yenching faces the future unalarmed.

BIOGRAPHICAL SKETCH OF DR. STUART

Grace M. Boynton

John Leighton Stuart was born on June 24, 1876 in Hangchow, China. He has a pioneer heritage which in view of his own career seems of especial interest. His great grandfather left Virginia to settle in the frontier state of Kentucky, where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ransylvania College which is in a town near Lexington. The son of this Robert Stuart was David Todd Stuart, a cousin of Mary Todd, who became the wife of Abraham Lincoln. This grandfather founded an institu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women which was called Stuart College, and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at region. Pursuing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new ventures, Dr. Stuart's father, Dr. John L. Stuart, came among the early missionaries to China. Faithful to the instinct to further education, he opened a boy's school in Hangchow, which, however, was closed by his mission because of their view that preaching was the proper function of the missionary.

It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to speak at some length of the experiences and influences which were important in Dr. Stuart's youth. In his boyhood the family was school, hospital and society in one, and the bond was strong and the loyalties were deep through the isolation of that family unit in the midst of a different race and culture. And this perhaps, is the point at which to speak of Mary Horton Stuart, President Stuart's mother.

The writer never saw his father, but Madam Stuart is a vivid memory, from the days when she lived in her son's home in Peking. It is often said that a man who achieves is usually debtor to a great mother. In Dr. Stuart's childhood any missionary mother had need of remarkable gifts and powers. She must be not only the parent of her children but their doctor, nurse, tailor and teacher combined. She must do all this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a large part of her attention and strength to her husband's work. All this Madam Stuart did, and she did it not only with devotion and success but with a sweetness and gaiety that in her old age exerted a peculiar charm over us who knew her. Even at the age of seventy, her energy seemed inexhaustible but it was never of the bustling kind. Rather, it was benign. It carried her into the hearts of us all. I do not know when it began, or who started it, but I remember that for the whole Yenching community, faculty and students alike, she was known as "Mother Stuart".

Outside of the family life the Stuart children, of whom there were three, John Leighton being the eldest, had a share in Chinese life. They went with their father on his journeys among the people. They learned to speak the language as

Chinese children learn it. They were also taught to read and write. But at the age of eleven, Dr. Stuart was sent to America. Then began the experience which brings suffering to many children of missionary parents,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children. The boy newly arrived from Hangchow, took a desperate determination to conceal that difference. He sometimes speaks of a school to which he was sent where he managed to keep it a secret that he had been born outside the south, and where no one was allowed to suspect that he knew anything more about China than other boys of his age.

In 1892 he entered Hampden-Sydney College, Virginia. This is one of the smaller institutions which has maintained a peculiar distinction, and has, it has recently been discovered, a higher number of graduates in *Who's Who* in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 than Harvard University. During his college course, he found that his tastes were definitely scholarly and that his main interests lay in Greek and Latin. His general inclination was toward teaching, and his ambition suggested that to be a college professor in his chosen field was the thing he would like to do. Upon graduation he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which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take his A.M. in the classics. For reasons which he has not explained, he felt it his duty to decline. He went as a teacher to his old school, Pantops, at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where he remained for three years.

There he soon found the possibility of a long period of what proved to be congenial work. The boys interested him; the principal was ageing. Why not settle into the life of this school, with further study and the college professorship as future objectives?

It took Leighton Stuart three years to work ou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The obstacle which confronted him was the inner conviction that he ought to be a minister. It was an urge which he fought for three years because he knew that if he accepted ordination, the obvious and inevitable next step would be to return to China and share in his father's work. To the young scholar, who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Greek and Roman classics, the prospect of preaching in Hangchow presented no attractions whatever.

Religion is a subject upon which Dr. Stuart displays great reserve.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him to say very little which is intimate and personal upon this topic. But in the choice of his career, the religious motive was paramount. His faith demanded his whole life. In the autumn of 1899 he entered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He remarks, in speaking of this decision, that as matters have turned out he was saved from entering a profession in which he probably could not have remained. "With the trend in education against the classics which has developed since that time,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I should have had to drop my Latin and Greek and go into some other field". This may be taken as a bit of the dry humor which is constantly appearing

in the President's remarks, but he made another comment which was entirely serious: "I have always found", he added "That when I have submitted to the dictates of my conscience, I have never had cause for regret."

He graduated from the Seminary in 1902 and with two classmates spent two years travelling among the churches of the South enlisting their support for Missions. These efforts were so successful that "money rolled in to the Board". One of the classmates was Lacy Moffett who later came to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s Dr. Stuart. These two young men,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 with the churches, went to New Orleans Louisiana. There they met two sisters, Aline and Catherine Rodd. Within a year there was a double wedding and the Moffetts and the Stuarts came out to China together.

Aline Rodd Stuart was married in November 1904 and arrived in China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Two years later, her only son, the Rev. John Stuart was born. He is at present a minister in Baltimore Maryland. From the time of his birth, the young mother's health declined, and when the Yenching Community knew Mrs. Stuart, she was very frail, and often so ill that she was confined to her room. Whenever her strength permitted, it was her joy to open her home to us all, and I remember her, a slender figure with a sweet pale face, soft hair clouding her forehead, and a smile that seemed both bright and wistful. Everything about her suggested delicacy - her pretty southern voice, her gentle ways, her beautiful hands. She was at once a perfect contrast and a perfect complement to Mother Stuart and if the latter was vivacity and energy, the wife had a pervasive exquisiteness which was drawn out toward those who knew and loved her as the perfume of flowers is drawn out in the rain and the dew. It was during the early Commencement which Yenching held prior to moving out to the new site, that Mrs. Stuart became critically ill. She died on the 5th of June 1926, and hers was the first grave in our cemetery. Dr. Stuart's close friends are aware that her memory is to him a perfect thing which lives with him, increasingly precious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When Dr. Stuart returned to Hangchow in 1904, he joined his father and plunged into his work. He also began the scholarly study of Chinese which he says has in large measure taken the place with him of his Latin and Greek. He continued in preaching and studying for three years, and then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faculty of the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This was an opening into the academic life which he had supposed was closed to him when he sailed from America. He had even left his Greek and Latin books behind him, on the advice of his father who had known many missionaries to bring books to China which were never opened after they arrived here. The young man would not trust himself to decide. He left it to his Mission. His scholarly bent was evidently recognized and he was sent to Nanking. "You see" the President commented at this point "As a missionary I have gone

from bad to worse. First I left preaching for teaching, and then I left teaching for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The eleven years in Nanking were in some respects the most satisfying Dr. Stuart has known. He was absorbed in the routine of quiet academic life where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ere possible with his students and his colleagues. He published books in Chinese: among them *Essential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and *A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He also compiled a 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or use in his courses. Then in 1918 he was invited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There was nothing attractive about Yenching at the time. We were miserably housed inside the city, without facilities or equipment. The institution had been recently organized and was full of jarring factions. It had less than a hundred students, and a faculty with only two Chinese members (Dr. J. F. Li, and Dr. Ch'en Tsai Hsin). Many of the foreign members of the faculty had few qualifications for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finances of the new venture were in the discouraging condition of a budget of \$50,000 and an income of \$25,000, which meant an annual deficit of half the running expenses. The trustees in America were men without any especial concern for Yenching. The University was to them only one of many interests, so that the President says some of them would come to a trustee-meeting rather doubtful whether the business to be voted upon concerned Yenching or Bayreuth College in Smyrna. In fact, the beginning was so disheartening that Dr. Stuart says there had been a long search for a man who would shoulder the load. When the invitation came to him, he knew of several people who had already declined it.

In the midst of the confusion and the discouragement however, Dr. Stuart saw possibilities. He saw that there might come into existence a Christian college, broadly conceived, which would contribute to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 It might maintain the values of the early missionary motives of sacrifice and service, and give them a modern expression. It might become a place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ers could work together with no sense of difference, sharing alike in resources,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ments. This last was the possibility which most appealed to him, and caused him to come to Peking. At the time of his coming he made one condition which he must now look back upon with amusement and wonder. He stipulated that he was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aising of money for Yenching. That was not to be his task.

In recalling this condition I am reminded of a remark of his when he returned from one of his many money-getting trips to America. "I never see a beggar", said he "Without a feeling that I belong to the guild."

I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the majority of us to conceive of the crushing responsibility which financial problems have brought with them. We have now

some five million, which is due in the main to the efforts of Dr. Stuart. For him there is never any relief from anxiety. The development of Yenching has been so rapid that when one realizes that it has all taken place since 1919, it seems hardly credible. The steps must be very briefly summarized;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each step entailed money, and money in large amounts. This is money which represents the coining of a man's vitality. The scholarly temperament does not enjoy the atmosphere of the business world. The man of affairs does not easily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details of tactful approach to wealthy individuals. It is only fair to reckon with the fact that Yenching has been bought with a price. One may hazard the guess that it was no more difficult for the young man to enter the ministry than for the mature man to enter what is ironically known as "the money-raising game".

The first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nching was the finding (and financing) of a faculty. The next was the securing of a site outside the city walls where the Yenching Community could have its own life. The next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lant. Each new building created a new demand for money for its upkeep. The power-plant was the worst. "It's like a great hungry beast", Dr. Stuart once said wearily. "You throw it all the money you can find, and it devours it all, but never has enough".

Faculty and plant attracted students in large numbers. Each student created a financial puzzle. Student fees cover (as is true in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arely one seventh of the cost of education. Yenching had no resources from which to supply the balance. An endowment became imperative. It is now the most crying need.

Dr. Stuart has been interested in many phases of educ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he has experimented with courses and department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raining for definite needs in society and assure the graduate of a job. Several such experiments has been given up because of lack of support, but we still have courses in Pre-medicine, Pre-nursing and in Journalism and Education which are of this na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ident has never relinquished his interes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and support has been won in various fields for important research. The most conspicuous achievement is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his is concerned with Sinological studies and is made possible by a substantial gift for the estate of an Oberlin graduate named Hall, who left a will directing that his money be used in setting up foundation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should further the cultural contacts of East and West. Many gifts were made for this purpose, but the gift to Yenching was the largest. This, says Dr. Stuart, is because of the confidence the executors of the estate came to have in Yenching's future. They estimated that future in terms of Yenching's President.

It remains but to speak of Dr. Stuart's connection with affairs outside the University. He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 has friends among men in public life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But he considers his connections as limited and unimportant compared with his work for Yenching.

It is not possible in the life time of a given individual to 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areer. But perhaps this statement may be ventured: in a time when East and West have been brought together into sudden, and for the most part inharmonious contacts John. Leighton Stuart has given himself to the attempt to found a university in which there should be "no sense of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ers and Chinese, but where both should share in a common life, in resources,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ments alike."

It is for Yenching to demonstrate whether that attempt has succeeded and can survive.

司徒先生六旬壽序

作人壽考詩篇以頌文王養老膠庠載生遠播殷制是知典學者必得其年頤和者莫宜於學自三代而然矣欽維司徒先生稟奇胎之資居資萌之位獻身西序委說燕京過化存神立其誠成德達材兼其術造士三千遠逾青莪之還捐金萬笏詎億華首之期洵所謂緇衣之薦好淇奧之瑟調者矣用是騰聲三輔蜚譽九洲群推爲祭酒人仰若霞鶴其誰曰不宜茲值蓬室叶律之辰幸逢六麟設弧之慶花甲浹周木公鞠采同人會謀揚輝晉祝爰誦小雅之章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榮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茂壽無期燕京既爲華夏學術柱石謂爲邦基非乎則先生眉壽之徵寧煩著龜乎復誦邶風之篇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先生以美籍而造福中土國士邦援能毋敬以思乎從此第願鼎鼎川流長並南山之壽年年今日重開北海之樽諸序息縣劉盼遠敬撰宛平董璠敬撰涇陽于式玉博白王力開平李鏡池南和沈國華長白奉寬東莞容庚吳縣郭紹虞大倉陸侃如沂水聞一多永嘉劉節無錫錢穆清河顧頡剛敬賀

YENCHING ALUMNI NEWS

Special Number

for

Dr. J. L. Stuart's

Sixtieth Birthday

CONTENTS

A. English Section

- I. Complimentary message from Mr. Nelson T Johnson, American Ambassador to China
- II. "The Dr. Stuart I Know".....Prof. Lucius C. Porter
- III. Biographical Sketch of Dr. Stuart..... Prof. Grace M. Boynton

B. Chinese Section

- I. Biographical Sketch of Dr. Stuart.....Translated by Mrs. W. T. Wu
- II. Complementary Inscriptions
 - Mr. Lin Se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 Dr. Wang Shih-chieh, Minister of Education
 - Mr. Wu Ding-chang, Minister of Industry
 - Dr. Y. T. Tsur, Ex-Acting Chancellor of Yenching University
- III. Complimentary Messages.
 - Dr. H. H. Ku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Yenching University
 - Mr. Wu Lei-chuan, Ex-Chancellor of Yenching University
 - Dr. C. W. Luh, Acting Chancellor of Yenching University
 - Mr. S. J. Chuan, Chairman of Yen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 Mr. Lei Ssu-shang, Director of Bureau of Social Welfare, Peiping Municipality
 - Mr. Hsueh Ying-po
Student Self-Government Association, Yenching University
- IV. Special Article.....Prof. T. T. Lew
 - "Difficulties in Administering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China - J. L. Stuart, a Conqueror of Difficulties
 - J. L. Stuart, One Who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Difficulties"
- V. Contributions from Alumni and Alumnae
- VI. Complimentary Messages from Various Branch Alumni Associations
- VII. Miscellaneous
 - An Account of A Church Service in Honor of Dr. Stuart Held at His Birthplace, Hangchow.
 - Program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Dr. Stuart's Birthday at Yenching.
- VIII. Statistical Reports

廿七年五月十四日
王伊育先生贈送

Yenching Alumni News

Special Number

for

President J. L. Stuart's

Sixtieth Birthday

June 24, 1936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